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一百二十期 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编者的话：江青是罪人还是病人？她应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问题不光是对外行，对于专业领域中的内行而言恐怕也是一个难题。若从单一的领域，比如单从政治、社会、道德、心理、病理去判断，恐怕不能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在实际生活中，这些因素是纠结在一起的。

周淑英与赵柳恩女士的回忆，为我们在“旗手”和“罪人”之外，提供了江青的另一个形象——一个处于更年期的有病的女人：骄横跋扈，残忍冷酷，疑神疑鬼，怕这怕那，歇斯底里，刁钻难缠……怎么看都是病人，但彼时的她却在参与治理中华，从事“高级的脑力劳动”。

在这里，通常掌握着患者命运的医护人员的命运却捏在患者的手里，她的手中拿着“白衣党”和“反革命”的帽子，随时准备乱扣。于是治疗和护理工作成了政治上的冒险，搞不好轻则训斥辱骂，重则关押流放，甚至有生命之虞。就连医学权威吴阶平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更何况那些普通的医护人员。患者兼主人，这一双重身份令医护人员进退失据。她的那些明显病态的要求被当作圣旨对待，却无人敢提醒和约束她。这无形中助长了她的病态，使医护人员的处境更加艰难。江的悲剧在于，她的威势并非来自其自身，而是得自于身后的巨影。

从另一方面讲，江的病根深埋于历史。彼时，娜拉出走，从压迫奴役的旧社会走进自由解放的新社会，她寻求的不止是阶级的解放，也是性别的解放。作为被解放的女性，她不但是革命者，也是革命伴侣。但新的却好像是旧的反影：《野百合花》揭示了新的阶级的不平等，《三八节有感》则揭示了新的性别的不平等。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整风压制了娜拉们的抗争，同时在权斗中压倒了“新阶级”。对毛而言，“新阶级”不但掣肘他的权力，还要干涉他的婚姻。对江而言，他们不但代表着新的阶级，也代表着新的男权。他们先是干涉她的婚姻，然后不让她干政。从家庭中出走的娜拉，重新被束缚于家庭之中——一个最终以男权为核心的政治家庭。这种家庭内外的政治、感情与性的压抑，可以解释江的病态。而对政治的参与给她提供了一条发泄渠道，也使她的病态变本加厉。

现在回想起来，毛的文革延续了《野百合花》的主题，只不过鲁迅式的“匕首和投枪”变成了大批判的急风骤雨；江的文革则在此之外，仍回荡着《三八节有感》的旋律。只不过她要做的，不再是沙菲女士怨妇式的牢骚，而是要在男人主宰的权力斗争中成为主宰。

想想样板戏里的那些无家无爱的女英雄，再想想在那些样板戏里，几乎所有坏人都是男人，而唯一的女坏蛋，地主黄世仁的母亲，脾气是那样刁钻，难以伺候，对待喜儿是那样残忍——这引起人喜剧式的联想，在现实中，女英雄和地主婆集中地体现在“江青同志”身上。对于这种人格上的分裂，她浑然不察。造反派和当权派，解放者和压迫者的合二而一，虽说是现实中的矛盾，却也是历史的真实，也是某种人性的真实。

保健护士谈江青（上）

口述者：周淑英，女，1945年生，1967年10月—1971年11月任江青保健护士

赵柳恩，女，1948年生，1971年1月—1974年12月任江青保健护士。

采访者：郑仲兵、李宇锋

参加者：阎长贵、杨银禄、张云生

时 间：2005年3月23日

周淑英、赵柳恩（以下简称周、赵）：文革期间我们都曾任江青的保健护士，除了负责她的医疗保健外，她的衣、食、住、行等等都离不开护士。那段时间我们与她朝夕相处。

我们和她怎么个接触法？可谓是“紧密接触”。就是她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这套全部管。包括她服的每一粒药、打的每一支针、吃的每一顿饭、喝的每一杯水、穿的从内到外每件衣服，全部都要经过我们的手。特别是她吃完安眠药进卧室，每次都得扶着她走。我们搂着她的腰，她胳膊搭在我们的肩以防跌撞。就这种接触，就这么近，紧密。医疗护理和日常生活的事，我们全部负责。

时间过去几十年了，那段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日子仍记忆犹新。这么多年来，我们都不愿意接受采访和写回忆文章。一是往事不堪回首，这些回忆会使我们身心不快。在粉碎“四人帮”江青受到正义审判后，我们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过去接受的保密教育使我们不想和外界多接触，也不想谈这些往事，担心掌握不好分寸，所以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此外，个别媒体和作者不尊重事实的演绎和炒作，也是我们将一切采访拒之门外的原因。江青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人物，涉及她的文章和专著已发表不少，但其中有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以致以讹传讹。如今，我们这些曾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人都已进入老年。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回忆往事，将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之事客观地记述下来，为今后研究这段历史提供素材，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现在我们感到有必要也愿意敞开心扉来谈那几十年前所经历的事情了。

郑仲兵：（以下简称郑）：完全理解你们的顾虑，也感谢你们的信任！我们保证最终发表的文章一定经过你们二位受访人确认无误。

杨银禄（以下简称杨）：宇锋、郑老师这里算是咱们的一个平台。咱们每个人限于经历的事情和工作时间的不同，各自所知道的事情都是枝枝节节，不那么完全，如果大家都谈谈，不就完整了吗？就可以反映出一个比较真实的江青。

李宇锋（以下简称李）：多年以来，社会上对江青这个特殊历史人物的叙述大多流于简单化、脸谱化、漫画化、妖魔化。真实的生活中的江青究竟什么样，你们作为医护人员应该有很大的发言权。刚才您说到“朝夕相处”，这四个字可是非同小可！在那个特殊年代，全中国都算上，谁能跟江青朝夕相处？另外我想，作为医护人员，你们还有一个优势，可以用专业的眼光观察江青，从生理、病理这些角度去考虑，是不是对她还有不同的判断和认识？比如一个简单的问题：江青是不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是不是有某种程度的精神障碍，或者变态？她那些“怕”，那些疑心，那些经常的没来由的歇斯底里，究竟是所谓“思想问题”、“品质问题”还是生理问题？恐怕也比较复杂，外人说不清楚，外行也说不清楚。

杨：江青在特殊时期这段真实的历史，我们这些亲历者最清楚。外边传的很多事情都不准确，如果我们不说，关于江青的那一时期真实历史就不完整了。什么叫历史？历史就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经历过的事件的记载，或者说经历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实事求是的记载。只要我们不添油加醋，不捏造，不乱编，实事求是地把这段历史说清楚就很好，很重要。

阎长贵（以下简称阎）：说一说我的情况。十几年前，我曾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林青山打过一场官司，他写的《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1988年出版，是对历史毫无价值的一本书。真是怪事，有一年在天津市委党校召开的学术会上，我随便跟他聊过几句，他就写了一本三四十万字的大书，发行十万册。官司从1989年立案一直打到1992年，最后调解书有三条：在一家有影响的报纸上登致歉声明（后来《致歉声明》登在《法制日报》上）；书不准再出；赔1500元钱。据北京中级法院民庭管这个案子的法官讲，这是第一桩文革名誉侵权案。之后有人劝我：“你应该写一点儿关于江青的回忆录。你不写，别人到处在写你呀。”我也觉得应该写一点儿，1998年退休后我主要就是做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的，虽然有些事情看似很小，但是都是发生在大人物身上，所以这就有意义。有人说：“大人物身边无小事”，是这样的。所以我同意写，到现在我大概也写了几十篇文章，受到一些读者的欢迎，也引起了一些研究文革的学者的兴趣。我感到我们做这个工作有意义。我写的有关于江青的，有关于毛主席的。我觉得我写的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不仅写文章，记者访问我，也从不说不假话。虽然江青曾经下令在秦城监狱关了我八年，又流放了五年，我还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绝没有给她添油加醋，我觉得那样没必要，也没意思。

初识江青

李：言归正传。你们为江青做护理工作之前，有思想准备吗？

赵、周：我们来楼里时，有关领导及同行前辈就交代说，江青因为一些疾病，曾在国内及苏联进行了一系列检查治疗，之后出现了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内分泌失调，易眩晕、出汗等。因此对她的护理具有特殊性，如说话的声音大小和语速要适中；走路要轻，不能带风；不同季节室内温度都要求严格；还有出汗时如何换衣服等等，讲得非常认真详细，生怕遗漏一个环节。

周：前任护士带着我，她工作细致、动作灵巧。这些多是平时没见过的特殊护理要求，教科书中也没讲过，难度很大。我一度提出，自己胜任不了这份工作，还是让我走吧。领导让我服从组织安排，边干边学。我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了这个工作岗位。

李：记得您说过，在江青身边工作和在外边是“两个世界”，您能具体讲讲怎么个不一样吗？

周：那时期江青的形象经常出现在电影、电视和报刊上，可近距离见到她本人后，感到反差很大。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在钓鱼台11号楼的二层，那天她在走廊散步。我在拐角处远远地望去：一个身材修长，穿着黑灰色束腰长衣的女人，被人搀扶着，在紫红色的地毯上踱步。走廊每隔十几米就有一把扶手椅，每走到椅子处都要靠坐一会儿，用白色小毛巾擦头发。她肤色白而微黄，没戴眼镜，头发散乱。——这就是我的第一印象（以致我在几十年以来，有时梦中情景常是在铺着红地毯的走廊里，她身着黑睡衣，飘飘地就这么走来了……我往往是在她咬着门齿紧闭双唇的怒容和斥责声中惊醒，情绪难以平复）。

进一步再接触，我发现她连起床、更衣等日常生活都不动手。我刚到楼里的时候，是不能直接为她服务的，也不能马上见到她。前任护士做，让我通过门缝往里看（这是见习）：见到连扣子都是护士给她一颗一颗扣，她自己是一点都不动手！再加上经常无事生非地发脾气，又狠又凶！这与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戴着珥琅镜、身着军装、手举毛主席语录微笑点头的江青真是判若云泥……

李：怎么听着有点疹人的感觉，或者叫“鬼气森森”？

赵：接触江青后，我就是精神紧张，身上也发紧，是那种根本无法放松的感觉。

周：不少接触过江青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有人甚至紧张得发抖，这些放在后面说。当时在全国红海洋形势下，人们手举红宝书口念最高指示，面对毛主席像作早请示晚汇报。而这

里工作人员并没被要求这样做，开会时简单说几件事，然后赶紧忙自己的工作。有次江青在大会堂乘电梯，眯眼靠坐在椅子上。开电梯的服务员念了“下定决心……去争取胜利”。江青被惊着了，气愤地说：“岂有此理！竟然对着我念主席语录！”从此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事（不过江青外出穿的衣服口袋里总有一本毛主席语录，换洗外衣时，我们必须帮她放好）。我当时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外面和楼里情形大不一样。

我先后三次经历了江青下令捕人的事件。第一次是刚到钓鱼台 11 号楼不久，就目睹了阎秘书被江青陷害的经过。江青凶神恶煞般地罗列了强加给老阎的罪名，硬说他偷了保险柜的钥匙，不容申辩就押出 11 号楼。有一个细节给我触动特别深。事发前阎嫂来京探亲，老阎曾找我借了十元钱。就在他身陷囹圄时还不忘托看守辗转还我钱——这是多么实诚的人啊！我得知阎嫂和几岁大的孩子也被隔离看管了，老阎被投入秦城监狱。想想他老家的老父亲老母亲和孩子有多么凄惨！我躲到值班室看着这张钞票暗暗流泪。

此后，我又不断见识江青的厉害。比如，1968 年的杨余傅事件。在钓鱼台 16 号楼，我亲历了傅崇碧和他的秘书遭江青当面诬陷、训斥的经过。江青声色俱厉，硬说因公并被批准进入钓鱼台的傅崇碧是“武装冲击钓鱼台”。傅的秘书由于紧张、惊恐昏倒在地，手提包也掉在地上。江青硬说这位秘书要用皮包打她，皮包中还有手枪。江青一句话就是一纸逮捕令，而蒙冤者无处伸冤、无处讲理，后来傅崇碧和秘书都受到迫害。

在杨成武出事前不久，江青还在吴法宪的陪同下去过杨家，那次可是和和气气的。在门厅，她说“见见孩子们”，在家的孩子都见了，她还微笑着摸摸孩子们的头说“娃娃真可爱”。没过几天，在杨成武被抓后，我亲眼看到，同一个江青，坐在住所 11 号楼楼梯拐角处，咬着牙说：“光抓他不行，他家还有大儿大女呢，都给我抓起来！”那年我才 22 岁，真是被当时的场面吓得发抖——这变脸可真快啊！杨家这些孩子何罪之有？江青的变脸使我感到她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

赵：我去之前是一点都不知道“厉害”。你想啊，我是 1969 年 4 月才从边远的桂林（解放军一八一医院）调来北京（解放军三零五医院），不久又下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支左，又跟去了农场，一直在下边，从来就没有近距离接触过江青那样的大领导。虽然调去之前有点紧张，但是，因为以前没听说过任何关于江青的议论，就没有任何畏难心理，而且当时她那个身份、那个地位，能去那里工作，多少也有点高兴。

先是张耀祠局长跟我打过招呼，后汪东兴主任正式谈话。汪主任交待，在那里工作，一个是保密纪律，有些看到的、听到的，一辈子都不能说，要烂在肚子里；一个是遇到一些事情要能忍，要顾大局，“要永远做一个不倒翁”（这句是他的原话）。他当然了解她的情况了。

江青对我的第一印象还可以。据带我去见她的杨银禄秘书事后告诉我，江青认为我“说话语速还适中，人也比较温柔、文静”。其实那次见面很简单，杨银禄先介绍，“江青同志，咱们来个小护士，你看看。”她从三四个台阶上下来，我说“首长好”，她说：“以后不要叫‘首长’，叫‘江青同志’。”我说，好。“什么地方的人啊？”我说广西人。别的还说了什么，不记得了。总之，算过了老太太的关了，她要是不满意你肯定是开路走人。

我去的时候还有个插曲。汪主任后来告诉我，他向主席汇报江青那里调来个新护士，主席问是“哪里人”，他回答“广西人”，主席说：“广西人好，广西人会打仗”。我当然知道主席不是说我会打仗，估计是白崇禧、韦国清这些人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我真正直接为她服务是一年以后了，这之前一直是周淑英带我“见习”，打打下手，帮助叠叠被子，开窗通风，洗衣服什么的。有时候，周淑英为她服务，我就站在一边看。为什么呢？江青有这么个习惯，身边有个熟人以后她永远不愿意用新人，新人使她老觉得紧张。有一天，她不高兴了，训斥我：“你站的不是位置，让我紧张、出汗了知道吗！”从这时起，我才逐步感受到在她身边工作那种动辄得咎的压力。

容貌、称谓、起居饮食——“生活江青”

李：请您二位具体讲讲，生活中的江青，或者说“生活江青”有什么特点？

周：我们为她服务的时候，江青已经五十多岁了，可头发依然乌黑浓密有光泽（据她说得益于母亲的遗传）。她身材修长，皮肤白皙（她的皮肤属油性，弹性比较好）；大眼睛双眼皮，鼻梁比较直，鼻尖右侧有一颗突出粉褐色的痣，左下颌有颗长毛的黑痣。除下巴略显松弛外，没有明显皱纹；门齿稍向外凸，平时抿着嘴唇，发怒时咬紧门齿双唇紧闭。（全楼的人都知道这是个坏的信号，江青要发脾气整人了，不知道楼内外谁又该倒霉了！）她手指细长，让人感到这是一双多年保养很好的手。

赵：江青体重保持在一百零几斤，一米六六的个儿，身材相当好。她从来不化妆，没有化妆品，用的牙粉、擦脸油都是中南海门诊部药房配制的，没有任何刺激性。

我们为她服务，她要求我们一律称她“江青同志”。新来的人第一次和她见面，如果称她为“首长”，她会纠正：“以后不要叫我首长，叫我‘江青同志’。”我们当面都称她“江青同志”，但后来在背后都称她“老太婆”。

周：有一次，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的一位演员称江青为“江老”，江青很不高兴，脸一下就沉下来了。回到住处她很气愤地说：“齐××竟然叫我‘江老’，难道我真的有这么老吗？真是莫名其妙！”

赵：你问“生活江青”，咱们就从她的起居讲起。

虽然她的起居不是像普通人那样正常，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很讲究。每天在江青起床之前，我们要到外面大树底下看挂在树上的温度表，观察树梢动向，风向以及风力。呼叫护士的两声铃响后，全楼人各司其事都行动起来了。护士进了她卧室，先把紫色丝绒窗帘掀开一个缝，留一层白色绸纱帘在里边，这样光线柔和，既有点亮，也不能让强光刺激她。“江青同志晚上睡得好吗？”这是江青每天起床，护士例行公事必须说的问候话。她会说，“唉，马马虎虎”，或“没睡好”、“老做梦”。接下来我要报告天气情况，然后双手搂她的肩，她抱着我的脖子，我借这个劲儿把她抱起来……

李：抱起来？

赵：对，她躺在床上，我得抱她坐起来，赶紧把大睡衣从后面绕过去给她穿上并系好腰带。再往她身后放个大鸭绒靠垫，她就靠到后面的靠枕上。先喝一杯浓的龙井茶，这是她早上起来第一步。

然后吃苹果。她吃的是绿色皮的印度苹果（国产的），一天一个。护士都给她削好切成块儿，放在一个杯子里面，放上叉子，再倒上温水（她从来不吃凉水果），她得慢慢地把这个苹果吃了。我们就给她去拿麦片粥，美国产的那个老头牌的麦片。我记得那个盒子上图案是个戴卷发头套的老头，我问过程师傅，他说是“老头牌”的。麦片再加了鲜奶油、鸡蛋清和水（蛋黄她从来不吃），搅和煮成粥。早上起来就吃这么一碗麦片粥。

阎：说到凉水果她不吃，冰镇的西瓜她也不吃，要吃就要用锅蒸一蒸。1967年“七·一”党的生日时，主席在游泳池请工作人员吃饭，江青就这样吃西瓜，当时我感到很奇怪，因为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赵：她起来以后坐在床边，我们就给她把里外睡衣全部都脱掉，再一件件帮她穿上日常衣服。给她穿袜子穿鞋包括系鞋带。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是护士给穿脱，这一点都不夸张的。有时午睡仅躺一会儿也是这个程序。

她为什么要用护士呢？最合算。医疗方面的护理是护士管，生活上也是护士管，她就是不想要那么多人，她见人多了出汗，她紧张。

周：她曾说过：“我就用一个秘书、一个警卫、一个护士，我这样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我一个人工作，你们那么多人跟我转还转不过来么？你们得跟上我的步伐。我不像总

理那样，用那么多人”。听得我挺生气的，总理是多大的工作量啊！而且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超负荷地工作。

赵：我们在那儿干一年，就没有一天休息，天天都在忙碌。她希望给她服务的护士必须没有家，全身心地投入到她这儿。二十四小时两个护士都忙的团团转，一个护士根本忙不过来。因为上班这个护士，要跟着她片刻不能离开。下班那个就得给她洗熨衣服、整理房间、准备药啊，或者是给她去取药……。

我刚去的时候还挺壮的，有 100 斤左右，后来就瘦成八十斤了。怎么造成护士这么累啊？就说吃饭吧，值班那天，我们没有去食堂吃饭的时间，饭都是别的工作人员帮着打回来的，打回来什么就吃什么。一两饭，路还挺远，打回来以后就凉了，用开水一倒，就成泡饭。就这样。刚吃上一口，铃响了，一声叫秘书、两声叫护士、三声叫警卫。她叫护士都是些什么事呢？“我的笔掉地下了”，捡起来给她；又打铃，“裁纸刀又找不着了”，你给她找；再打铃，“我的铅笔怎么没有啦”、“我出汗了”……反反复复的小事。这一弄，这顿饭吃八次你也吃不完。为什么呢？一倒上水以后她叫你了，回来以后又凉了，又倒上水泡一会儿，又吃两口，就这样一天要吃上一两饭就很不简单。这种经历导致我离开她很长时间后，一听到铃声还会紧张。

杨：我最怕这个铃声了。

赵：护士不仅吃不好饭，觉也睡不好，甚至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1974 年她搞批林批孔那阵，曾连续五天我没怎么睡觉，晕头转向。到了大会堂，她开会我就坐福建厅外面犯困。那些工作人员都知道，江青的护士、警卫，在大会堂都是坐楼梯台阶上守候着不敢离开。我们要按时准备给她吃药，随时伺候她换衣服，熨衣服等等。再疲劳也得准备在她招呼时随时出现在她面前。晚上十一点钟以后食堂有夜餐，可是我们都不能去，都是别人帮打回来，坐在那台阶上吃。有时候还没吃两口，“江青出来啦！”我们把碗往旁边一推，就赶紧跑出去了。不是她身边的人全部躲到屏风后面去，包括原来警卫局的那些老局长，统统都躲到屏风后面，谁也不敢出来，只要她出现没人敢在外面露面。

周：长期的紧张、失眠使我和小赵经常出现头痛，有时头痛剧烈还伴有恶心呕吐。口袋里总得带着止痛药。这病痛伴随我们也几十年了。让我一生都难忘的一想起来就激动的是周总理！总理最理解和体谅我们：都是年轻人哪，实在太疲劳了！总理怕我们挨尅，往往在散会以前，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早出来几分钟，提醒大家：“马上散会了，清醒清醒啦！”顿时大家起立做好准备，我们赶紧站在会议厅门口迎候江青，今天就算安全过一关。如果她出来没看到我们会发火的。大家都感到总理在百忙之中的一句提醒是何等重要啊！

散会以后，江青回来还要看电影。她一边看电影，我们还得给她全身按摩，做指压穴位疗法，让她放松以利入睡。

赵：她睡觉那套程序特别复杂。首先是按时服用安眠药。她是从晚上七点开始吃非那根一类作用轻微的药，诱导她慢慢地镇静；小量分次给药，直到她临睡觉前，开始吃巴比妥类的药了。她一般都是夜里两三点钟睡觉。

赵、周：我们这里强调一下，她吃的药不是我们护士定的，是由一个医疗专家组研究商定的。每天虽然服用次数很多，但每次的量并不大，胶囊里有赋形剂成分填充。

赵：她吃药讲究多，水合氯醛里边还加上果汁（不加果汁很难吃啊），必须在睡觉前吃，而且还得吃温的。可她每天睡觉前蹲马桶的时间长短不一定，就得不断加温，保证随时是温的。

她晚上睡觉之前要进卫生间坐在马桶上，看一下《参考资料》、《国际共运》一类材料，这时护士给她洗脚。对洗漱用水的温度也有要求，护士事先给她兑好了。洗漱完毕从卫生间出来，她就要穿上丝绵的大袍，坐在一个特制的沙发上。沙发中间挖了个洞，底下放便盆，坐在上面解手。前面还有一个大沙发，厚厚的大海绵，她往上一趴。如果是她今天不愉快或

心中有事，睡不好觉，稍微在那儿趴一会儿就起来了；如果那天她没什么事，她就在沙发上睡着了。这一觉她横竖从三点多钟能睡到早上，有时睡到上午九点。我就一直在那儿这么坐着，一直坐到上午九点，不敢叫她。不能叫她，绝对不能叫！有一次我得了感冒，咽部发痒怎么也憋不住，就咳了一声，她歪过头：“你故意的啊？”我说没有，我感冒了。“感冒为什么不吃药？故意吵我。”我只好尽量地憋着不咳嗽，就这样事情我们经常遇到。

李：刷牙洗脸是她自己来吗？

赵：刷牙、洗脸是她自己做。但是毛巾是我们给她拧的热毛巾，她自己擦。小周在的时候每天晚上还给她做口腔护理。

周：她牙周发炎，请 301 医院口腔科洪民、曹家信两位主任来医治。治疗一段时间疗效很好，江青就让我跟着他们学习。近两个月的医治，拔除了病牙，牙周炎症已消退，她就让医生回去了。为巩固疗效，江青叫我每晚为她冲洗牙周清洁口腔，防止炎症复发。几年下来每天如此，她再没发生过牙周炎症。

赵：最后她上床睡觉的时候，要把外边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脱，再穿上睡衣。她要躺下的时候也是给她抱着下去，把她的睡衣往下抻平（她穿的是过去苏联时期的那种布拉吉里面的那个衬裙，很长的那种睡衣，真丝的），两边被子都得给她掖好。她是根据天气和气候用被子，不用厚被，只用薄薄的丝绵被。比如说天气冷了，加一床毛巾被，如果再冷一点，再加上一条短毛巾被。如果加减被子不合适，她感到热或凉了就会拿护士问罪。根据天气应该穿什么衣服，护士就给她增减。所以她的衣服全部是我们管的。

周：她经常说“我是一个高级的脑力劳动者，这些事我是不要动脑筋的”。所以如果吃饭多点了，有些打嗝，她会边用牙签剔牙边说“怎么不提醒我呢？我吃饭是在想着事情呢，脑子根本不是在吃饭上”。这吃饭多少的事别人怎么提醒啊？

赵：还包括提醒她上厕所。到人民大会堂去开会，钓鱼台到大会堂有多远？而且一路是绿灯，你说能有多长时间？可走之前要不提醒她上卫生间，这可坏了！在车上一路骂你，一直骂到人民大会堂。后来没办法，车上准备便盆，随时解小便。有时还要在车上换衣服，每当这时候她让升起车厢中间的隔音玻璃，还叮嘱前排人不要回头、不要看反光镜。

周：我说说江青的饮食。负责给她做饭的是程汝明师傅。程师傅为毛主席和江青服务了二十多年，其间有十多年专门为江青做饭，对她的秉性和饮食习惯了如指掌。除了江青提出要求，平日食物都是由程师傅安排。每顿一荤、一素、一汤。江青喜欢吃鱼、虾、蟹、童子鸡，蔬菜中菠菜泥经常吃。

赵：我们工作人员戏称她“菠菜泥吃不厌，《红菱艳》看不厌”。

周：主食上她吃面食比米饭要多些。江青也喜欢西餐，如罗宋汤、奶油起酥、苹果派、烤鲑鱼、煎牛排等。程师傅专业水平相当高，工作又认真负责，做饭注意营养搭配合理，中西餐兼顾。他不用味精，保持食物天然味道，菜肴精致，讲究卫生，很适合江青的口味，而且饭菜量都很合适，基本不浪费。有时她肠道不畅就增加些奶油和粗纤维食物来调节。程师傅做的饭菜江青是满意和适应的，而吃其他师傅做的饭往往会消化不良。因此在大会堂开会要就餐时，经常是程师傅亲自上灶或电话遥控大会堂师傅。

说到程师傅，我得多说几句。他为人正直、坦诚、宽厚，处事稳重，是非分明，是大家的主心骨。我们遇到难事、受了委屈都愿意向他倾诉，寻求帮助。他总是像老大哥般地劝慰开导人，常出主意帮人摆脱困境，而且能仗义执言。1974 年我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程师傅得到消息，就利用上午为江青取菜的机会和内勤小王带着苹果来到我家。他们语重心长地劝导我，可谓患难见真情。当程师傅讲到江青等四个人利用批孔、批儒，锋芒所向周总理时十分愤慨，我们当时都对总理的身体状况感到心痛和担忧。

江青的几怕

李：我们都知道江青有几怕，这些“怕”，大概很多都涉及护士的工作范围，开始您二位也提到对江青护理的“特殊性”，请具体谈谈。

赵：首先是怕风。江青特别容易出汗，她有时棉袄和内衣都湿透，头发也经常湿漉漉的，要经常换衣服和帽子内沿，有时候在大会堂开一次会得换几身内衣，因此她特别怕风（这一点以前我不大理解，现在年纪大了，知道好出汗的老年人真不能吹风）。平时只要一出楼门，就全身穿戴得很严实，还用毛巾捂紧口鼻，而且是背向门口倒退着出去，就是怕风吹。她经常说“针大的孔斗大的风”。在室内，她就让人举着一根点燃的香，看烟路是一直向上，还是拐弯，来证明屋内是否有风。一旦烟散开，她会说“肯定有‘贼风’”，就训斥工作人员“杀人不用刀，给我制造感冒，起了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这是软刀子杀人！”

周：有一次她让我找“贼风”哪来的，我举着燃香，把房间都检查了一遍，四层密封窗哪会进风啊！我想烟路向上散开是正常物理现象，可面对她无事生非又不能反驳。只好解释说：“您是不是身体不太舒服，感觉到有风？”没想到使他她勃然大怒，抓起小桌上一把剪信封的剪刀扔向我！

赵：但是她的房间还要很新鲜的空气。怎么保持新鲜呢？比如她在某个房间呆够一段儿时间以后换房间，这间你给我通风，打开窗户，进新鲜空气，通完风后把窗门都关上，还要保持规定的温度。

江青再就是怕声音。我们说话要站在她的斜前方，靠近说话你就必须蹲下来，不能高于她的水平视线。她要求我们说话要慢，声音要适中，走路时不能有衣服摩擦声，脚步要轻，不能带风，否则她就出汗。

周：要是一点声音都没有也不行，如果突然发现身边有人，她也会紧张。所以我们进她的房间时，要有一点轻微的声音，让她能意识到你进来了，这样才算恰到好处。

有一回，新调来一位替班的警卫员，第一次见江青时穿着布面牛皮底的鞋，走路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江青说“你这是什么鞋啊？可不得了，让我冒一身的大汗”！警卫员就赶紧换了双胶鞋，可房间里有一段铺的是橡胶地垫，鞋底蹭上还是“吱吱”响，江青要求他再去换鞋。又换了布底鞋后，这位警卫员紧张得都不知道该怎么走路了。他为了不出声，脚高高抬起再轻轻放下，就跟咱们有时候看的电影里那种慢镜头似地，江青又说：“瞧你那是什么姿势，怎么迈的步？”

杨：后来到大会堂开会，她说：“小杨你得跟着我去，叫他（警卫员）坐前边，你坐到我旁边。”我说为什么呀？“给我壮壮胆儿，我太害怕他了。”就这样，小周坐左边，我坐右边，江青坐中间，警卫员在前边不知所措。

周：几十年后，我们在一次会议上相见，他已经认不出我了。当我问他“牛皮底鞋还出声吗”？他立即喊出“是小周啊”！可见此事给当事人的印象之深是一生难忘的。

赵：她心情好的时候，既不怕声音，也不怕风。在海南岛、青岛疗养，她乘坐舰艇高速前进时风很大，她在快艇上还指挥其他舰艇，大喊“全速前进”！并对李作鹏说“你去告诉你的部队全速前进，我怎么指挥不动啊！”当时我观察江青，她一点都没出汗，也不怕风了。

周：在海南岛，有天晚上江青说早些睡，明天早点叫醒她好去赶海，把水桶和小铲子也备好。第二天拂晓全体出动，正赶上退大潮，江青兴致勃勃赶海，贝壳、小海蟹、海螺、海蛎子、海菜等捡了不少。太阳露出海面，海水又涨潮了，大家劝她回去，她自己把裤腿卷过膝盖继续走。海水漫过脚面鞋子湿了、水到了小腿、水过了膝盖、裤子湿了她全然不顾。我们担心她受凉在周围多次提醒，她才意犹未尽边捡海物边往回走。在海水中走了这么长时间，她也没任何不适。

江青在钓鱼台中心区10号楼住，窗户有四层玻璃，她说能听到军博路上的汽车声。还经常说外面鸟叫声、蝉鸣声影响睡眠。1970年11月，在海南岛高炮阵地，为了照相，她要求几门高射炮同时开炮，对震耳欲聋的炮声却毫不在乎。

郑：这在医学上有根据吗？

赵：人们这种情况下受精神因素影响特别大。比如兴奋点在摄影或赶海上，心情好的时候，对一些风、声音的刺激就不敏感也不在意。而在失眠时对声音就格外敏感。

周：江青还有个忌讳，就是怕在住处见到生人，因为见到生人会紧张，出汗，有时候还会生疑心。即使是每天送文件的机要通讯员对她也得回避。10号楼大门一进去就是一个厅，送信送文件的人，只要一听她要出来了，赶紧往两边跑。两边一个是开水间，一个是打扫卫生的工具间，能躲就躲。有一次江青没按铃就出来了，一个送文件的同志来不及躲了，就一下子蹲到沙发后面。没想到江青一下子坐在沙发上，我们紧张的心都要跳到喉咙口了，赶紧请她去空气新鲜的客厅散步，这才化险为夷。一位首长的警卫员说：一听江青要来大家都想躲开，可总得有个端茶送水的吧？轮到我值班只能硬着头皮送，真不知道你们这日子是怎么过的！

确实，江青常去的地方，人们一听她要来了，除了开电梯、端茶送水的服务人员以外，全都躲起来了，都怕飞来横祸。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1968年春，江青到大会堂开会，在会议厅门口，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很有礼貌地招呼她。谁知江青硬说成元功挡在门口不让她进门，怀疑里面开什么会。她气冲冲的往里走，在大厅门口江青大声叫：“总理，外面有条狗！”那天我在场，大家都很诧异，没见到周围有狗啊？江青怒目切齿喊着：“孙维世是一条狼，成元功是条狗，历史上就是个坏人！”（孙维世是革命烈士孙炳文的女儿，总理的干女儿，文革时惨死在狱中。）无论总理和与会者怎么解释她都不听，骂不绝口，还说“再也不想见到成元功了”。结果成元功进了学习班，而后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了七年，我们两人曾在一个排劳动。他1940年14岁时参加革命，1945年到周副主席身边，陪同参加重庆谈判；解放后随同总理出访各国。跟随总理二十多年，熟知总理的工作和生活习惯，曾共同历经风险。说到总理在这几年的劳累、为难和无奈，老成唏嘘不已。他当时虽远在江西，但对总理的一切仍是牵肠挂肚，对江青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矛头指向总理十分愤慨。

李：说她怕见生人，在青岛栈桥那儿她也不怕见生人了？

赵：那是她有思想准备，要见群众啊！

周、赵：江青生性多疑、神经过敏，常怀疑有人害她。怀疑是多方位的，包括见到的人（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吃的药、听到的声音、在楼之外吃的食物等，这种例子太多了。

周：有次在16号楼开文革小组碰头会，会上她吃了不少樱桃，转天牙龈有些不适，就怀疑樱桃有毒，她追查樱桃来源、怎么清洗的。查的结果是来源清楚，同桌的人吃后都没什么不舒服，这才不了了之。

她在一些会议上见谁不顺眼或哪句话不顺耳，就说“我一看你就是个坏人，XX给我查查他是个什么东西？”

赵：1971年她去青岛，游栈桥时有几个群众认出她，有的鼓掌、有的呼口号，围观的人很多，当时她很受用，兴高采烈。之后反过来说成是有组织的围攻事件，趁人多的时候谋害她。

周：了解江青的人都尽量回避她，周总理和其他领导到江青住处，他们的警卫员和医护人员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不管多长时间都在车里等候，连喝水都是内勤给他们送到楼外。谁就怕惹上是非，还不如躲远些安全。

随着职务的升迁，尤其是她当上政治局委员后，权力在手，脾气更见长。大家最难办也最怕的，是一些生活上的事，往往会被她上纲上线扣上顶政治帽子。

赵：还有就是怕冷怕热，对温度要求苛刻。江青对室温的要求是，冬天摄氏21度正负0.5度，夏天26度正负0.5度，钓鱼台她住的所有房间和常去开会活动的几座楼以及大会堂、中南海、京西宾馆等开会的地方都要求统一温度。当时钓鱼台各楼房都用中央空调，后来配

了单机空调。由于地方大，温度统一难度也大。我们把室温看成工作重点，小心谨慎地对待。而江青往往因为自己情绪不佳，硬说温度不准，无中生有，指责工作人员。

周：江青既要求空气新鲜又要室温只能有正负 0.5 度的波动范围，这副重担落在几位内勤兼楼内警卫同志的肩上。他们几位来自警卫毛主席的一中队，朴实、机敏、责任心强，素质都非常好。虽然有的来自农村，但尽快掌握了当时罕见的中央和单机空调通风技术。他们负责楼内警卫、卫生、烧水包括随车水箱的准备，有时还帮我们洗江青的衣服。多年来我们值班时，饭都是他们从食堂帮着打回的。为了让我们能安心睡一会儿，他们在门口值班时帮我们听打铃。遇到难事时都互相关心鼓励，这些战友给予我们最默契的配合和支持。

赵：江青对洗漱水、饮用水及饭菜也都有温度要求。有次她感冒，对温度格外挑剔，她喝水时，一会说“你怎么给这种温吐吐的水？我的胃要坏了。你这是害人哪！”稍加一点热的，她又说：“你想烫死我？”我们只好找来一把水温计，校对好后，将入口的东西都经过测温。

她从不直接用卫生间热水龙头的水，嫌温度不恒定；脸盆的水不流动又不卫生。我们要在大搪瓷缸兑好水，她边洗手时要以一定速度给她倒水。后来我们也有经验了，水兑好了，放到自己手腕内侧这个位置试，这里的皮肤是最敏感的。经常试温，感觉也准了。

赵、周：除此之外，说到她的“怕”，我们听到江青多次说过“我不怕被杀头，就怕不死不活地给养起来”。说此话时表情凝重。要我们看，与其他几怕相比，这可能是她的最怕了。

郑：这或许多少反映了她的性格和人生观。从后来法庭宣判时她高呼口号以及最终选择自杀为结局的举动看，在这一点上，她是说话算话的。至于如何评价她的价值取向，那是另一回事。

江青的医疗保健

李：江青对日常生活要求如此苛刻，据你们观察，她的身体状况究竟怎样？比如她经常需要吃药么？

周、赵：从江青病历及观察她身体状况，我们认为她确实有病。五十年代一些疾病和特殊的治疗造成她从中年就进入内分泌严重失调。一般中老年妇女内分泌紊乱是渐进的，还会有出汗、心慌、失眠、情绪波动等症状。而江青突然进入这个状态，对精神和身体打击很大。她曾说过当时眩晕使她感到天旋地转，自己不能起床；经常出大汗使她十分怕风；而失眠使她多年来必须借助安眠药入睡，对声音也格外敏感。这些我们都能理解。经过十多年来多位医护、服务人员的有效的治疗和精心照顾，到我们为她服务时，她身体状况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周：我接手保健工作时江青 53 岁，那时她没有出现过眩晕等症状，饮食、日常活动都很好。她对感兴趣的事如骑马、摄影、逛公园等，几小时都能坚持。可是她并没有动手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如穿衣服系扣子等。延续下来的护理方法仍旧照做，一些苛刻要求也丝毫不变，对她的这些作为我是想不通的——这哪像共产党员啊！

赵、周：江青曾诬陷我们给她吃的药是毒药，为此大闹政治局，所以有必要予以说明。我们接触过参与江青医疗保健的专家有吴阶平、卞志强、吴洁、曾诚富、黄宛、洪民、曹家信、孙震寰、高辉远等。江青用药的种类和剂量，是由吴阶平召集这些国内著名医学专家反复商讨制定的。根据江青的身体状况、睡觉情况，制定的处方既科学，又安全，能诱导她安然入睡。对药物疗效和副作用都充分考虑到了，以达到较好的效果。会诊后制定了用药处方，之后吴阶平将专家组讨论的方案报告江青，她看后表示同意。

赵：这些药大致分三类，一是保健类，包括西洋参、复合维生素等；二是助消化的多酶

片等；三是镇静、安眠药。到专供药房取药，必须要两人同去，药量严格按协定处方，药瓶火漆封口，而且取回的药大致限制在什么时间段内吃完。这些都是保证用药安全的一套措施。所以别看她吃药的次数多，但剂量都在安全范围之内。

周：吴阶平是我在江青处接触最多并给我们指导关爱最多的医生。吴大夫医德高尚、知识渊博、待人谦和，善于与不同的人沟通相处，组织协调能力强。毛主席、周总理晚年医疗抢救组都是由吴大夫负责牵头组织的，直到两位老人离世。从1968年开始，江青医疗方面的事就找吴大夫。吴大夫讲话深入浅出，语气平缓，江青见他不紧张，外出到海南岛、上海都请他同去。有吴大夫在，我们就有了主心骨，当江青在医疗上刁难人时，吴大夫的承担和解释往往起到化险为夷的作用。

大家与吴老的关系非常融洽，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件趣事。那次去上海，吴老想买一块上海牌手表。交了饭费后没剩多少钱，吴老只好借钱，我们把口袋里的钱包括硬币都凑给了他。回到北京，吴老拿出他的记账单，逐个还给大家，连硬币都分文不差。那时候，大家不管在京还是出差都按制度办事，按规定交纳伙食费，连著名的医学专家吴阶平也不例外。

1999年3月我们到吴老家看望他，提起那段工作经历，吴老用了八个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还提到在毛主席生病期间，医疗组日夜守候尽职尽责。江青不但不感谢医务人员，反而威胁说“苏联有个‘白衣党’（指为苏联领导人医疗保健的医护人员）专门害人，我看主席身边就有白衣党，有特务集团”。医护人员人人自危，毛主席得知这件事后当着总理和其他人的面对江青说：“如果说我身边有白衣党、有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这才使江青不得不暂时收敛一些。

为高级领导人治病的医生，本来都是精中选精、优中选优的权威。而为江青请来会诊和专科治疗的专家，不知原来是否了解江青的脾气秉性，见面后江青多疑审视的目光、尖刻的言语和苛刻的要求却常常使他们望而生畏。

举几个例子：

有次会诊，北京医院内科吴主任由于紧张，双腿抖个不停，直往人后挪；

还有一次，301医院曾诚富主任要为江青听诊，江青怕掀被子受凉，又怕听诊器凉，使曾主任无法听诊心肺，只好回医院取来一个有扩音装置的听诊器，小心翼翼地隔着被子听诊；

有一个时期，301医院口腔科洪民、曹家信两位专家为江青治疗牙周炎，搬来口腔科专用椅和器械，治疗效果很好。江青有一颗牙已松动，她本来同意拔牙，但又说大夫“太紧张了”她不放心，就请周总理和康生与大夫面谈以了解情况。总理听了汇报治疗方案后安慰大夫说：“不要紧张嘛”。后来江青的病牙被顺利拔出。两位专家为了给江青治牙病，在钓鱼台住了近两个月，江青非但不感谢，反而讥讽说“你们牙科大夫只能看那二三十颗牙，连咽喉病都不会看，算什么本事？我看要革你们的命！”后来还诬陷两位口腔科专家给她吃了毒药；

睡眠是江青生活中的老大难问题，请来中医老专家孙震寰为江青调理。孙老诊脉后开出药方，药煮好后，她只尝了一口便连呼“太苦，不能喝”；孙大夫想用针灸改善她睡眠，江青干脆拒绝了；孙老只好提出用按摩和指压穴位法治疗，江青同意了，还让护士跟着学。江青的几番折腾使孙老越加紧张，头上脸上都滴汗，呼吸都不均匀了。治疗了一段，江青提出护士也学得差不多了，大夫可以不来了，孙老如获大赦赶紧走了。

这些国内、军内著名的医学专家多年为首长看病、治疗，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为江青看病却艰难棘手，正如曹家信主任在一篇文章提到“为江青治牙，其艰巨性、危险性是从未想象过的。

赵：有一位化验员曾多次为江青采血，每次来她都会紧张得手抖。有次采血前她手抖得厉害，我怕江青发现，连忙在她前边挡住江青的视线，让她顺利完成采血。因为江青如果发现她紧张会起疑心：为什么见我这么紧张？心中一定有鬼！

周：从这几位的经历，你就可以想象我们每天都在她身边工作，会是一种什么心境。随

便举个令我们工作中为难的例子：在开会时为她送药。因为担心沾上涉密嫌疑，我们尽量不进入会场。但是江青对吃药特别警觉，她的药必须是我们亲自送，别人送她是不吃的。所以怎么既避嫌，又保证她按时吃药，是很伤脑筋的。相比之下，周总理在这方面就坦然得多。有几次，总理的医生让我送药时把总理的药也带进去。我每次将小药瓶儿递给总理，他接过药瓶，把药倒在手里，一口水就送吃进去了。周总理对我们是那么信任，他的凝聚力和人格魅力使我们感到亲切。我们真是从内心尊敬、爱戴他！

赵：有一次江青在福建厅开会，那天可能她在政治局里面闹得不愉快了，一下子生气了。服务员跑出来对我说：“你赶快进去，江青同志在里面发火了，她说你没给她吃药！”我赶紧进去。当时纪登奎坐在她旁边，我说“江青同志你有什么事？”她怒视着我：“我的药到时候你为什么没给我吃？”我说“刚吃完啊”。“什么时候给我吃完的？”我就说“你跟这位首长（指纪登奎）谈话的时候我给你吃的”。那时候总理和政治局其他人都在，都瞪着眼睛看着这边。江青自己觉得没趣，就说“那你为什么不主动进来给我换衣服？我出了一身汗了！”我赶紧说，“那现在给你换吧？”我们那时候谁敢跟她顶啊？实事求是地说谁也不敢跟她顶嘴。我们就去一个小房间换衣服，换衣服的时候她说“这些事情你应该主动地进来”。我心里想你开政治局会议我敢主动进来吗？类似的事情经常发生。

护士的行头

李：她这些衣服你们还都随身带着？

赵：是啊。开一下午会，她得换好几次，换下来的来不及洗，我们就马上给熨干（到哪儿人家都得给我们准备电熨斗），不然再换就没有干的了，回去以后才能洗，也是我们的事。我们每次出门都得拿什么？衣服包、水箱、氧气箱。装衣服的是一个大包，除了几身内衣，还有薄的丝绵的棉衣，她吃的药，还有一包红虾酥的糖。

随车还得给提着水箱，里面放两个小保温壶，一壶是凉的水，一壶是开的水，还有两个杯子，一个杯子里面搁有茶叶，准备随时她要水喝都可以给她。到哪儿去，不管在车上，电梯里，走廊，她说喝水马上就要喝。

赵：一次去大会堂开会，刚进了大会堂，江青突然说“我要喝水！”小周说“那我赶紧回车里给您拿吧。”江青说“不行，来不及啦！”小周说“要不您到厅里喝？”“我渴啦，不行！”小周忙跑到楼下拿来水，双手递给她，江青嫌晚了，火冒三丈，啪，连杯带水扔到小周身上！

周：在场的大会堂服务员和警卫人员都很惊愕。江青进入会议厅后，他们过来安慰我，我强忍泪水一句话都没说。就差几分钟她就等不得了！她经常为一件小事大发雷霆。

江青做过心电图，心脏没有问题。而那时期周总理由于过度劳累，有时心脏供血不好，医护人员就带氧气箱备用。江青一看总理有氧气箱，就说“我也得准备”。于是叶群帮她从西郊机场弄了一个小氧气箱随身带，定期到机场换气。从此行头中又增加了氧气箱。

赵：后来还在卧室外放置了大氧气瓶，连接一条长管子，定时向卧室送氧。

除了小周说的那几样，还有一个鞋箱子哪。提篮式的，放个五六双鞋吧，到什么时候情况之下她该穿什么鞋，立刻可以拿。这些东西护士都得给准备好了，要不然到时候她要，没有，就得发火。有一年去广州，天热，她一定要随身带着乔其纱的连衣裙。可是随身带就会叠得全是摺，所以就挂在车上。江青不满意：“我身上随时都出汗，不给我换连衣裙？”骂了一通。结果那次另一位护士治了她——好吧，你不要我随时拿着、随时给你换么？她手里就举着那挂在衣架上的连衣裙。你走哪儿，我就这么举着，就像皇帝后面拿着两个那玩意儿。最后江青自己回头看见了说“是不好看啊，怪不得你们不愿意。算了，还是放回车里吧，我换时随时就拿来就行。”那是啊，你说那样雅观吗？其实那个护士是故意的，举得特别高，

就是让大家都看着。

服饰与发型——“女人江青”

李：说到鞋和衣服，我想咱们谈谈另一个话题，“女人江青”。我想，江青无论怎么政治化，怎么强势，到底应该有女性化的一面，就是所谓的“婆婆妈妈”，比如她的服装、发型、化妆品、首饰等等，请您二位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赵：刚才说过，她从来不化妆，也没有化妆品。她不喜欢首饰，不喜欢那些珠光宝气的东西，一样都没有，在她的房间和手里面我们没见过首饰。她只有两块瑞士进口手表和一块怀表。

外国元首送给主席的或是送给她的东西，都统统上缴礼品库了。服装方面，常穿的有十几套吧。两三套西装，几套中山装和军装。夏天穿的衣服就有几件乔其纱的短袖衣服。有两件棉睡袍和几件棉睡衣，大部分是在苏联治病时做的，都旧了。大衣有三四件。有一套灰派力司中山装是用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时穿过的衣服改制的。江青说“主席总也不穿，给我拿去改吧”。还有几件连衣裙（当时叫布拉吉）。她一般就穿纯棉的，化纤的、尼龙的一概不穿。

周：她的西装是灰颜色的华达呢的。棉睡衣一套绿的薄一点，黑的厚一点。一件小薄呢子灰大衣，办公的时候经常披一披。因为她怕风，叶群给她做了件带帽子的毛凡尔丁的小大衣，

赵：常穿的鞋子也有十几双，许多旧的老式皮鞋都不能穿了，放在中南海库房里。江青穿三十五码的鞋，她穿鞋有个特点，因为她有个脚趾畸形，所以绝对不穿前面露脚趾的鞋。有一年，我穿了一双东北出的带两条杠的凉鞋，胶底白帆布面的。她一看，“哟，你这双凉鞋看着挺舒服，我试试”。她试了一下，就让鞋厂定做两双。前面要封口的白帆布鞋。

周：我也遇到同样的事。我买了一双塑料凉鞋，她看了合意就试穿了一下，然后就拿这鞋到鞋厂，照样做了一双黑色的皮凉鞋，夏天一直穿。江青的脚是“解放脚”。她跟我说过，“我就是有反抗精神，给我裹了脚以后我就放开，还裹还放”。但是对走路还是有些影响，不那么平稳有力。

有次我穿双塑料拖鞋，她看了：“哎呀，你这鞋好，我这鞋太大了，咱俩换吧”。她就和我把拖鞋换了。

由于地位的限制，她出门不方便，见到商品很少。1968年她曾去过一次百货大楼，受到不少群众围观，只好匆忙离开商店。这也使她在选择着装时只能参照周围人的衣着。

赵：有一段时间，她说“出门也不能穿得这么死板，也穿点花衣服嘛”。这样就买了一些素色小花和小格子布，要我们陪着她一块儿穿，“你们做两件衬衫吧”。那时候我们穿的都是军装，谁也不穿便衣。她穿花衣服出去，我们只好穿在里面，外面穿军装。后来又要我们陪她穿裙子，我就穿条黑裙子陪她，因为她要穿你就得陪着她穿。

李：她那衣服有打补丁的吗？

赵：睡衣有。毛裤很旧。她的衣服拿去织补以后，外表看不出来。

杨：有一件灰毛料大衣破了，她让管理员请人织补好再穿。

赵：她几十年前穿过的衣服都盛在那几个旧皮箱里，这些旧衣服每件都有账。常穿的衣服，连两米宽的壁柜都没挂满。丝绵被和几条毛巾被也是旧的用了很多年了。毛巾她喜欢用最旧的，旧的软，吸汗，用着舒服。用的量很大，一擦一擦的。

周：她让把主席用过旧毛巾都拿过来。出汗多时来不及换衣服，就用小毛巾垫在前胸、后背处暂时吸汗。

李：她穿的衣服有没有什么美国法国生产的？

赵：没有，她没有什么名牌的，她的衣服多在总后服装研究所或红都服装店做。

周：除了背心是街上买的，连内衣也是定做。我记得秋裤是到北京市针织总厂定做的，有长有短，就是随着天气变化而定。我在那时她穿的都是黑色棉纱袜，袜子有长短两种。我们把袜子和秋裤分别钉上按扣，扣上后袜子就不会滑下去，可防止腿部受凉。

李：她比较注意舒适，不讲究什么其他的，是吗？

赵：对，她特别讲究舒适。也很注重仪表，口袋里放一把小梳子，经常梳梳头。她说“我出去要大方得体”。

李：江青很多照片都戴帽子？

周：她出汗多，怕风吹后受凉，外出时都戴帽子。北京饭店的朱师傅给她理发。江青的发型其实也是有讲究的，有人说像男人发型，实际上是为了便于擦汗，后边头发只好推短。而鬓角头发留的较长可梳到耳后，还是保留了女式发型。“破四旧”以后，普通理发店烫头发的东西都没了，人们也不烫发了。江青要烫发，北京饭店有给外宾用的烫发用品。朱师傅把东西都搬来，在十七号楼给她做头。头发烫出几个大波浪，擦汗后就不那么散乱了。朱师傅每次来都是小心翼翼的。有时江青说不行今天有汗，只好改天再来。朱师傅给她做完头以后，很怕她感冒。他说为江青做一次头，一个礼拜都不放心。

李：多长时间做这么一次啊？

赵：起码有半年左右。

看电影——江青的生活日程

李：我们都知道看电影是江青几乎每天必做的功课，请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情况。

赵：江青喜欢看《出水芙蓉》、《简爱》、《红菱艳》等电影。江青常说：“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坏了，睡不好，吃不香，我要休息，脑子转移一下了。”“转移”是她的口头禅，我们都明白这个词的含义。“转移”的主要方式是看电影、照相、听音乐、骑马，有时打桥牌。看电影是她每天最后一项活动。那时会议常开到深夜，散会后再看电影。

周：江青说：“我看电影是为了借鉴国外艺术，这是工作。”影片主要是从电影资料馆调来的馆藏国外三、四十年代的老片和“过路片”（一些国外片子在国内停留一段时间，不购买再转走）。江青说三、四十年代是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片子好看。当时和江青一同看电影的有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有时请了康生他也不一定来。17号楼电影厅旁有个小休息厅，江、张、姚常在那休息。有次我给江青送药时，听到江青夸奖姚文元的文章写得好，说“文元是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赵：有时她自己点片名，工作人员也帮助挑选。有些电影看后觉得可以放松，有利于睡眠，就会经常看。工作人员要熟悉这些片名，她随时会提出看哪部，如听不清或记错了，影响她情绪和休息就“犯大错误”了。两位放映员就更熟练了，江青提出看哪部片子中的哪一段，他们都能立刻找到。

周：我记得江青常看的影片有：《乱世佳人》、《恨海香魂》、《农家女》、《孤星血泪》、《煤气灯下》、《魂断蓝桥》、《鸳梦重温》、《瑞典女王》、《茶花女》、《深闺疑云》、《红袖倾城》、《蝴蝶梦》、《巫山云》、《翠堤春晓》、《鹿苑常春》、《风流女窃》、《巴黎圣母院》、《罗马假日》、《百万英镑》、《美人计》、《鸾凤合鸣》、《悲惨世界》等等。有时她指名看某位明星主演的片子，如：英格丽褒曼、贾里古柏、琼方登、嘉宝、泰伦鲍华、费雯丽、派克、秀兰邓波等。

李：外边传说江青常看“黄色电影”，这些电影也算不上什么黄色。

赵：由于文化差异，国外片有些搂抱啊、亲吻哪、穿三点式的镜头等等，这些在当年当然是犯忌讳的，但并不是什么“黄色电影”。

阎：记得1967年夏天，工作人员给她选了部名叫《广岛之恋》的法国影片，事先也没看。片子开头就有男女裸体拥抱的镜头，江青火了：“怎么叫我看这样的片子？”她怒气冲

冲地离开了，不过这次她并没追究谁。我并不是说《广岛之恋》是黄色电影，到现在我也没看过这部电影，其故事和内容都不知道。

李：看来，江青对所谓“黄色的东西”并不感兴趣？

赵：她感兴趣的是三十年代的一些片子。她特别喜欢摄影水平高的、演员演技好、风景美、音乐好的影片。

周：看电影还惹出一场风波。1968年夏的一个晚上，她看了电影《格雷的画像》。内容梗概是：主人公格雷请一个会魔法的画家给他画了一幅像，画像中有他的灵魂，格雷因此会青春永驻。画家告诉他不能干坏事，否则画像会变丑，坏事做的越多脸就越丑。格雷做了许多坏事，画像渐渐变丑，而格雷面貌毫无改变。当格雷最后一次进入藏画的密室时，发现画像如魔鬼般丑陋不堪。他在惊恐中拿刀扎向画像，随之本人也死了。深夜，江青看完这部片子，吃了几次安眠药都无法入睡。不断打铃，把护士、秘书、警卫全都叫到她卧室。我们进去后，看到她抱着头在床上痛苦地来回翻滚，疾言厉色地叫喊：“你们让我看了这么坏的电影！弄得我不能入睡，你们起到了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我们不知所措，只好每个人都做了“深刻的检讨”。等她喊叫稍停，大家建议她再看几本《红菱艳》。看了《红菱艳》后，江青才安静下来。经过这次教训，以后再选电影大家越发小心谨慎了。江青对这部电影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大家始料不及的，也使我大惑不解。

李：这个故事可太有意思了！说明她潜意识里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是有某种恐惧的，她未必没意识到那是“作恶”。

赵：她反复看《冷酷的心》，十分欣赏影片的色彩和技术处理。她看电影有个习惯，比如说今天想睡个好觉，就挑片子中有轻松音乐的那段。

杨：《红菱艳》里男主角攥紧拳头打玻璃那一段，她也常看。

周：江青忌讳有蛇、鳞的画面。因此凡是遇到有蛇、鳞的画面，放映员事先要将这个画面遮挡一下，时间掌握得十分准确。看电影是江青一项重要活动，样板戏拍成电影也在十七楼审样片。放映员技术堪称一流，从未出现过差错。十七楼的通风、温度也要和江青住处一致。放映员和服务员全天守候在岗位上，工作小心翼翼，十分辛苦。

李：说到电影，我们知道，江青是电影明星出身，文革中，她对这段历史十分忌讳，甚至不惜动用各种手段销毁历史资料、迫害知情人。您对此有所了解么？

周：我经历过这么几件事。1968年春的一天，在11号楼二层，江青按铃叫我给她换衣服。进了她办公室，只见室内一片狼籍。桌面、沙发扶手、睡榻上到处都是照片报纸等。我工作中信守的原则是对办公室的东西不看。她把睡榻上的东西挪了一下，坐在中间，我给她脱衣服擦汗。忽然她盯着我的眼，我请她抬胳膊擦一下腋窝，她却转身把照片翻过去，忙用衣服遮挡了。我收拾衣服时，看到掉在地上一张照片，能看得出是江青年轻时的照片，忙捡起来放在睡榻上。她敏感多疑盯人的眼神，使我忙抱着湿衣服赶紧离开办公室。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江青进了二层一间门朝南窗向西的小房间，不许别人进。一会儿烧东西的烟味飘到楼道，越来越浓。过了很长时间，江青出来了，她头发散乱全身烟味，衣服被汗水湿透。事后打扫卫生的同志说西边窗户大开，大花盆里的纸灰都满了。

此后过了一段时间，有天晚上江青让11号楼全体人员，在第二天上午她起床前时组织学习。学习材料有两个，一是鲁迅的《论人言可畏》，二是三十年代蓝苹的一封公开信。大家学习后由于不知时代背景，没弄清事情的始末。江青得知我们一头雾水后，就说“我在三十年代的遭遇就像阮玲玉一样，被反动小报攻击，流言蜚语唾沫星子到处飞。人言可畏啊，阮玲玉了却人生。我要抗争，发表公开信回击他们，我是发着高烧和他们斗争的。现在有人还造谣中伤我，你们太无知了，不要上当！”。

粉碎“四人帮”后，我才知道江青十分在意并不择手段掩盖三十年代她那段历史。文革初期江青伙同叶群派上海驻军战士，化装成红卫兵抄文艺界曾和她共事过的人的家，所抄到

的有关江青三十年代的照片和书报，作为绝密材料送给了她本人。不仅如此，还关押了一些知情者。三十年代她房东家的保姆秦桂贞，曾在生活上关心、照顾她，就因为了解江青那一段历史被叫到北京后关进秦城监狱。

养狗、骑马与照相——“休闲江青”

周：养狗也是江青“休息脑子，转移一下”的内容之一，她说狗最忠诚于它的主人。她养的狗都是从部队农场选来的。江青起名叫“小黄”的狗养的时间比较长。狗从农场进了楼房也不习惯，在楼里地毯上拉屎撒尿。江青到17号楼看电影也带着狗，那里地方大，狗在哪拉、尿，人们也不知道，每次都是闻到臭味才找到打扫。搞卫生的同志很无奈，处理地毯上的狗便真是窝囊死了。

李：那养狗吃的就是从食堂拿来的东西？

赵：主要吃她剩下的饭菜。楼里人也从食堂给它带点剩饭。

江青不允许别人喂，她要掌握对狗的饲养权。有一次江青吃饭后让我把她的剩饭留起来，等她开会回来再喂。我把剩饭放在楼外门口用碗扣好。江青回来喂狗时发现饭没了（其实是小黄溜到门外吃光了），非说是我喂了。别人告诉她我睡觉了。“睡觉也把她叫起来！”我实际上没睡，我哪儿可能睡啊？就在大厅进门那地方，她就问我“你是不是喂狗了？”我说没喂。“那为什么狗食没有了？”我说我放在门外面可能它饿了就吃了。“你肯定是喂了！”就开始喊起来了。接着气势汹汹地让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站成一排，把狗抱到远处突然放开，看狗跑向谁，以验证谁喂了狗。江青这是让狗指认人，小狗不但没跑，反而转过身对着江青摇尾巴。气得她把狗这么一下抱起来，“你不是喜欢小狗吗？”啪，就扔到我身上了，“你跟它一块儿给我滚出去！”

周：江青恼羞成怒，深夜两点就要赶小赵走。她说：“小赵喂狗讨狗的喜欢，这狗我也不要了。把小赵和狗一起送到农场，让她和狗住在一起！”还要立刻就走，说不走她睡不着觉。侍候江青入睡后当时已是深夜，我离开江青卧室哭着回到门厅，把江青的话说了一遍。大家对江青的做法很气愤，可敢怒而不敢言。老杨和大周商量并请示汪主任后，悄悄把小赵藏到17号楼的一个房间里。之后我和大周去看望小赵，她一个人孤独躲在房间里，委屈和屈辱使她泣不成声。大周还把半导体收音机拿给她听，希望能缓和一下她的情绪，

杨：她每天都看着房间里的毛主席像哭。

周：一周后大家看江青气消了，就说农场都是男战士，小赵在那不方便。江青才让她回来。

杨：没敢让她直接回来。怕江青问她农场情况答不出来，露馅儿，特意开车拉她去农场转了一圈，以熟悉农场的环境。

周、赵：我们曾戴着红领巾在阳光下成长，受的都是正面教育，江青的作为令我们非常愤慨、不解。论职务她是政治局委员，我们是普通党员；论年纪她是长辈，我们是小辈。她经常迫使我们做违心的自我批评，而她却肆无忌惮不受任何约束。真是欺人太甚，公理何在！

周：除了养狗，江青还喜欢骑马，这与在战争环境中，马是主要交通工具有关。她有一张1939年在延安、由斯大林摄影师罗曼·卡曼拍摄的她骑在马上回眸一笑的照片：她穿着军大衣，头发是两边编好用丝带束在头后，骑在马背上，身体前倾，回头那么一笑！那年她25岁，很年轻。她非常欣赏那张照片，翻印了不少送人。江青兴奋地讲起战争年代的一些事，她说她骑的马很通人性，一叫“马儿”它就乖乖的走过来，从不摔主人。夜间行军时马绝不嘶叫甚至连响鼻都不打。

江青想到了要骑马，就从部队借来几匹训练有素的军马。她看到马以后，情绪显得特别欢快，温和地抚摸着马的颈部背部！她骑术娴熟，50多岁的人，在左脚放进脚蹬后能一跃

上马。在大草坪骑了好多圈。她还教工作人员骑马技术，如脚掌只能前三分之一放在马蹬上，脚进去多了到脚踝处就危险了，摔下来脚被马蹬挂住人就会被拖死；拉马缰绳使马行走变慢，拉紧马就会停下来；两腿夹紧马肚子，马行走速度会加快至奔跑……讲解后她让警卫二处和身边工作人员都骑一下，结果二处一位警卫人员从马上摔下来，腰都摔伤了。江青还支起三脚架拍照，她也给我照了一张骑马的照片，她设计了我背着药包，骑马在奔跑。因为马跑得快，照片上的人有点虚。第一次骑马我很紧张，在照片上都能看出我害怕的样子。这次我看到了江青从没有过的好心情，感到骑马对调整她情绪是有效的，也就是她所要求的“转移”起到了作用。也可能是她又找回年轻时骑马驰骋在延安土路上的感觉。

赵：她去颐和园（那时也不对外开放）、八达岭，也带着马去。有一次她竟要在颐和园的长廊里骑马，警卫员大周急忙劝阻“那可不行！磕了脑袋怎么办？”她才作罢。江青去北戴河和其他地方，也常带着马。马是挂在火车后边一节运货车厢带去的。

李：周老师，说到江青给您照过相，她照相可是行家啊。

周：江青很喜欢照相，她说在苏联养病时，医生为了使她的情绪稳定，建议她听音乐、照相，从那时起开始学照相。曾请石少华当老师，给她指导。她照相要先用测光表测参数，用光十分讲究，如顶逆光、侧光，要详细记录摄影数据。

赵：江青总叫小周给她记录光圈、速度等照相条件。

周：她喜欢照花卉。有一次她照迎春花，还为这张照片题了一首诗，那意思就是这迎春花啊比较低贱，不是高贵的花，就像一个小丫头一样，不被人所重视，但是很坚强。她说这个挺像她的。

李：是旧体诗吗？

周：我能看懂，不是旧体诗。后来她又拍牡丹、芍药，还让我们往花上滴水，制造露珠的效果。

杨：她到中山公园、景山、颐和园、北海都照过花。

周：有一次在天坛，到了那花房一看呢，有很多兰花，公园负责人介绍说有些是朱老总养的兰花（朱老总喜欢养兰花，但是文革中，好多兰花都送给天坛公园了）。江青看了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养那个”，很快就出了花房。

杨、周：江青发表的《提高警惕》和《月夜哨兵》，拍的是深夜月光下的警卫战士和二处的警卫人员，既要突出人物又要顾及月亮，所以用光很讲究。还采用了辅助光，相机打开B门，深夜用了几个小时才拍好。那期间她发表照片所用的笔名是“峻岭”或“大海”。

赵：后来还照过飞机。

杨：西郊机场、杨村机场飞机表演，叶群和那“四大金刚”（整理者按：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去了。

李：是专门供她照相举办的飞机表演吗？

赵：那就说不清了。

李：要真是这样，她这照相的成本也太高了吧？

杨、赵：她自己照相的花费也不少，为了还钱，经主席同意从他稿费中拿出些钱来。

赵：毛主席有不少好照片都是她给照的。

杨：在庐山上给主席照的，坐在藤椅上那张。还给我一张，用红蓝粗笔写了“请杨银禄同志惠存。江青”几个字。

周：从洗印出的照片和发表的照片来看，江青的照相技术还是比较高的，一些内行的人也是这么认为。我看这是有原因的：一是照相器材好。相机是德国造的，胶卷是伊斯曼的，灯光是从新华社借的，洗印照片在新华社。这些在当时都属于顶级器材和最好的技术。二是老师好。石少华、吴印咸以及毛主席身边的摄影师都是国内一流的，由这样老师亲自讲授指导，是提高技术极好的条件。三是江青照相时很专注。她讲究用光技巧，白天光强，取景时

用蓝色丝绒布蒙着头和相机，时间长了头发都被汗水湿透了。她在照片洗出来后，把每张照片与拍摄参数进行对照，以利提高技术。四是拍照选材内容丰富又特殊，如庐山仙人洞、海南岛高炮阵地、西瑁岛女民兵、海军快艇乘风破浪、空军机场腾空而起的飞机、景山公园里的牡丹和芍药……。江青有她得天独厚的条件，她可以进入军事要地要求高炮发射，进入机场拍摄飞机腾飞，进入文革中尚在关闭而老百姓不能进的公园拍花卉。在那个年代这一切全国只有江青能办得到！其他人，哪怕技术再高超的摄影师也无能为力。五是工作人员配合，如江青要求的顶逆光、侧逆光、侧光等都是由身边工作人员动手摆放灯架给光。至于花和叶片上的露珠，也是我们细心地滴洒。有时人手不够，警卫二处的人也一起干，时间长了配合得也都熟练了。像《提高警惕》中的警卫战士，深夜趴在草丛中，张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坚持配合了好几个小时。

1971年，江青吩咐把钓鱼台十七楼的一个房间布置成照相室，摆上照相设备给许多人照相。

杨：林彪的《孜孜不倦》的光头像就是在那儿照的。

周、赵：我们目睹了江青为林彪拍摄《孜孜不倦》的全过程。1971年夏天，江青邀请林彪、叶群到钓鱼台照相。几天后叶群来了，她说：“让江青同志久等了！林副主席感冒来不了，您就给我照吧。”江青先在室内给叶群照，然后又到室外拍。叶说：“我眼睛小，不上相。”江建议她往前上方看，镜头仰角拍。叶群见到照片后很高兴，说照片上她眼睛大了，人也年轻了，是她一生最好的照片。

六月初，林彪过来照相。他下车时，被帽子大衣包裹得很严实，还用毛巾捂着嘴和鼻子。他告诉江青前几天身体不好没能来，还夸江摄影是内行。

林彪的胡子很长，在叶群再三劝说下，同意用杨秘书的刮胡刀刮净胡子。江青先用测光表在林彪面前测光，又让他双手捧毛选作阅读的姿势，毛选也是老杨从十号楼拿来递给林彪的。江青手握快门线，低头看取景器，刚要按快门，突然抬起头来说：“一大疏忽！快摘帽子，在室内学习，哪能戴帽子？”林彪迟迟不愿摘，江青说：“要拍得真实些嘛！”一边亲手摘去林彪的帽子，而林彪是很不情愿的表情。在这二、三十平米房间里江青采用了她照人物最喜欢用的顶逆光，江青认为这样用光人物轮廓好、面部光柔和。林彪姿势是低头看书，我们第一次在近距离看到不戴帽子的林彪。灯光下，他的头皮坑坑洼洼，有几根稀疏的毛发。事后我们两人私下议论：林彪在战争受过伤怕受风，公开场合从未见他摘过帽子。全中国也只有江青才能在林彪本人不情愿的情况下摘掉他头上的帽子！

这张江青署名“峻岭”题为《孜孜不倦》的照片，发表在1971年7、8月份合刊的《解放军画报》和《人民画报》上，在全国广为发行。江青精心导演并为林彪拍摄的这张照片，是“九一三”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前最后一张半身免冠照。这两件事，时间间隔仅三个月零四天。

杨：为了给林彪照好这张相，折腾好长时间，我看林彪都有点烦了。

周：九大以后江青曾邀请陈伯达来照相，她还主动与陈并排照了两人合影。当时陈伯达显得很勉强，在场的人也都很诧异。事后陈伯达私自取回照片处理了，江青得知此事大发雷霆，把陈伯达和图片社的人大骂一顿。

江青平时尽管称陈伯达为“老夫子”，实际上对他并不客气，经常拉着脸训斥他。陈伯达书呆子气很重，不注意生活细节。有一次来11号楼时把大衣挂在衣架上，那衣架很大，可以挂好几件大衣。他从会客厅出来，穿上一只袖子就走，差一点衣架就倒在身上，幸亏警卫员手疾眼快扶住了衣架。

惊动政治局的“毒药事件”

李：江青的不好伺候是出了名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经常突如其来地发火，而且辱骂工作人员，您能具体描述一下么？比如她都骂什么啊？是骂两句发泄一下就完，还是没完没了的？

杨：她骂人最多的就是“混账”、“滚”。

赵：比如到大会堂的车上，她常骂：“你这混账东西，走之前为什么不提醒我上厕所？闹得我现在这么紧张，都出汗啦！”

周：“呀呀呜”是江青常说的一句上海方言，意思是“不中用”，说这话仅表示她不满意，但还没动怒。她生气时会说“制造感冒”、“制造混乱”、“起到阶级敌人起不到的作用”等等。

赵：她常说“你们用软刀子杀人”。发怒时说“你给我滚”，而我们不能走也不能动，要老老实实站那儿。

杨：当她第二次再重复这句“滚”的时候，那你才可以走。第一次说你“滚”，你还真不能走，她会说：“我说叫你滚你就滚啦？！”

赵：在那里工作，一个礼拜里如果有一两天没有挨骂，你会觉得日子真是太好过了！没有哪天她那个嘴是闲住的。

杨：领章帽徽什么时候给你扒的你还记得吗？

赵：是1972年春天，起因是吃药。前面说过，江青每天晚上分七次服用安眠药。除此以外，在她卧室的床头边上还准备有三杯药，如果睡眠不好，半夜醒了她自己喝一杯，睡不着的话再来第二杯，再睡不着加第三杯，这都是医生给她安排的。本来是备份的意思，但是她不吃的时候简直是太少太少，几乎是每次都吃完三杯，因为她睡眠就是不好。那天，她把三杯药都吃完了，到早上七点钟左右还没睡着觉，她就打铃叫我，说“我一晚上都没睡着觉”。我说那怎么办呢？她说“晚上我那三杯药你没给我摆”。我说我给你摆啦。“你撒谎！”我说我没有，我真的给你放了。“你再给我拿一杯药来！”我心想再拿一杯药来，就等于多加了巴比妥一类的药了，我怎么敢做主？她非要，没办法，我就打电话请示大夫，大夫同意加药。

江青吃了这次药后还是没睡着（我觉得她那段时间她心里有事），就说“我不睡了，起来”。你想想谁吃了安眠药以后不睡觉，起来是不是要头晕？正常人都头晕。她一头晕起来就说：你给我吃毒药了！让我把所有她服用的药写出来，药名、剂量等。我列出药单交给江青，她看了一遍。来到17号楼放映大厅旁的小厅。然后叫来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就把这单子又交给徐业夫：“我的护士给我吃毒药，请你把这个单子交给主席！”当时徐业夫就一个劲“嘿嘿”地笑，徐秘书是位老红军，他毕竟在主席身边呆的时间长，也了解江青的做派。江青说“你还笑！我的护士给我吃毒药，你还笑！”徐业夫就不言声出去了。他走后我们回到大厅，江青接着问，“是不是周淑英让你给我吃的毒药”？我说“她没有叫我给你吃毒药”。“不对，就是周淑英叫你给我吃的毒药！”我说小周不可能叫我给你吃毒药。“那你是不是她带的？”我说我承认是她带我的。“那不就她叫你给我吃毒药吗？”我说她带的我，但不可能教我给你吃毒药啊？“你现在说还不晚，因为你是胁从犯。”我说“江青同志，确实周淑英没有叫我给你吃毒药。”“你还不老实？你敢保证？”我说“我敢保证。”“拿什么来做保证？”我说“党性。”她说“你还说党性！你这个不老实的东西！”上前“啪，啪”撕扯下我的帽徽和领章，“你不配戴这个帽徽领章！”一把摔到地下。我也没动，就在那儿站着。她又琢磨一下说：“哦，这是宝贝，不能扔地下”，又捡起来揣到她口袋里面去。这是在17号楼大厅东门发生的事，当时警卫员大周（整理者按：指周金铭）在场。

我作为一名解放军干部，从参军之日就视帽徽、领章为国家、军队的象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江青近似疯狂地撕扯动作并把我敬重热爱的帽徽、领章狠狠地摔到地上时，我惊呆了。我受到侮辱，我犯了哪一条国法军纪？被她撕扯去象征军人尊严和重任的帽徽、领章，只因我说了句真话！我心中愤怒，凭什么江青肆意对日夜为她服务的人可以大施淫威！我感到无助，没想到她会做出如此举动，更不知道她下面要采取什么手段整治人！那时我才20

多岁，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心想豁出去了，她爱干嘛就干嘛吧……之后我不说话，泪在眼里打转，忍着不让她流下来。

杨：接着江青叫我“赶快打电话给汪东兴，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都到我这儿来开会”。开什么会呢？我大概知道一点，因为她发脾气了嘛。汪清楚啊，一般都是总理召开政治局会，江青开会那很异常。汪东兴很快就跑来了。后来汪告诉我，江青跟他说“今天政治局的同志都到这儿来，对他们三个人进行审讯”。汪说哪三个人哪？江青说：“杨银禄、周金铭、赵柳恩！”

赵：我知道你们在场，但是跟你们两个有什么关系？

杨：有关系啊。汪东兴说“不能叫审讯，政治局怎么审讯一个工作人员呢？叫问话”。江青说：“不行，就是审讯！”“那还叫问话，不能叫审讯。”这时汪东兴又说，“那我打电话，叫他们来”。这就都来了，总理先来的，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吴德、张春桥、姚文元，加上汪东兴，一共来了八个人嘛。总理来了以后，汪东兴先把总理领到小客厅，先跟总理说了说这个事。人都来了，把我们三个跟审官司一样，政治局委员在长桌的北边坐着，面朝南。

赵：17号楼大厅成了“审判室”，江青是主审官。她半夜三更叫来八位政治局委员企图让他们成为“陪审团”。厅内有一个长条桌子，江青和其政治局委员坐在桌子北面。我、大周和老杨在桌子南边，我在江青正对面，江青旁边是周总理，叶剑英在顶角那儿，这个我记得很清楚的。

江青诬陷我给她吃了毒药。她时而声嘶力竭地咆哮，时而咬着牙紧闭的嘴唇，脸上的肌肉在抽动，真是凶极了。

杨：那个阵势一摆，就把人吓着了么。实际上我们心里很坦然，你问什么我们答什么，一个是没给你吃毒药，再一个没坏心，也没做坏事，我们怕什么啊？江青站起来了，那个下巴往下一伸（她厉害了以后就那样），桌子一拍，“杨银禄，你给我站起来！”我就站起来了。“我问你，周淑英怎么调到我这儿来的？”我说怎么调来的我不清楚，是组织调来的，如果你不清楚，你从组织上了解了解。“你给我坐下！周金铭你给我站起来！”周金铭就站起来了。江说“你给我证明，我吃的是不是毒药？”周金铭说：“江青同志，你这个吃药都是由医生征求你的意见，你同意了，到底怎么吃，我也不清楚，我也不是医生。”大周她也没说法，“你给我坐下”！这时候才问你（指赵）。

赵：问完以后江青就把我写的那张药单子递给总理了，总理说“她能写出这单子来就挺不错嘛”，总理就想把事情搅淡乎了。她就拍着桌子冲我喊：“你给我吃毒药，你还敢不承认？”后来叶帅问：江青同志，我想问一下什么是毒药啊？江青说：安眠药就是毒药。叶帅说：你可以不吃吗？江青说：不行，不吃我睡不着觉！叶帅说：那你不能少吃一点？江青说：少吃也不行。叶帅见她无理取闹，就走到一边去不理她了。

杨：于是叶帅起来，从大桌子那儿走到对面角那儿，仰坐在大沙发上，闭上眼睛不再说话——坐那儿装睡呢。江青的恶劣做法使总理发火了。我从来没见过总理这么样。

赵：总理看到江青这么飞扬跋扈，我的帽徽、领章都被江青撕去了，那次是真发火了，他气愤地对江青说：“你对她态度好一点好不好？她还是孩子啊！……你把这么个小女孩的帽徽、领章都撕下来了，我都替你难过！”面对江青的恶劣行径，总理忍无可忍发了脾气：“你对她客气点好不好？别说她紧张了，我都紧张啦！”当时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也在现场，是江青叫他进来的，说“你也进来听听，受教育”，张佐良吓得直哆嗦。总理就喊“张佐良！我紧张啦，我已经紧张了！赶紧给我吃片非那露！”

江青当时下令，把她放药的保险柜和所有吃的药都贴上封条封上。她吃的药、喝的水都不让我送了。封完后汪东兴就开始害怕了：她封自己的药柜可以，千万别把中南海门诊部的药房给封了，那样中央这些领导就别吃药了，就没法运作了。

杨：完了以后也没问出名堂来，当时除了总理、叶帅以外，其他人都不吭声。

赵：只有周总理发怒说出来的话才能压一下江青嚣张的气焰，其他人就看着，都不说话。

杨：江青最后说：总理，今天晚上要把三个人抓起来。总理说哪三个人哪？江青说，洪民、曹家信（这两个是 301 医院的），“301 有妖，他们就是妖”。还有一个杨红喜。他是颐和园的军代表，原来是 309 医院的政治处主任，也要抓起来。当然总理没有听她的。

赵：江青擅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她亲自审问为她服务的护士、警卫员、秘书三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其权力之大、级别之高是史无前例的。面对江青的穷凶极恶的审问，我坚持实事求是地回答。之后，屈辱、无辜、惊吓和愤怒使我木然站在那儿。领章被扯后，红色缝线还耷拉在军服领子上，我就不伸下来，就让那根红线那么垂着。这时周总理走到我面前握紧我的手，他语重心长地安慰我说：“小赵，我本来准备今天跟你谈谈，但是因为我还有外事活动，没法跟你谈了，你要想开一点”。总理还说，“要看在毛主席的份上”。总理真诚的目光、亲切的话语、有力的双手给了我力量，我点头答应了。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泪如泉涌！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几十年后再次提起，那惊心动魄的场面仍使我心有余悸。

周：小赵讲述的这段事，我虽没在现场却如身临其境。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江青权力之大，正如我曾听到江青在各种场合说过的：“我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杨：这中间还有一小段，江青说“我的护士不能用啦，总理你得给我想办法”。这临时上哪儿想办法去啊？总理说那把我的护士给你送来看看能不能用吧？许奉生就来了，来了以后哭的那眼都肿了。

赵：是周总理的警卫员高振普给许奉生打的电话，说总理叫你马上到钓鱼台来。许奉生就害怕了，以为总理病了。她说总理怎么了？高振普说总理没什么，叫你来，江青要用你，许奉生开始不相信……

周：因为 1968 年江青重感冒时许奉生已经来过 11 号楼了。工作几天后江青就让她回去了。

赵：对。这次让她到钓鱼台来是真的，当时我正在门口“待罪”，目睹了这件事的始末。许奉生知道江青难伺候，不愿意到江青这儿工作。从中南海过来时一路都流着眼泪，进 17 号楼时眼睛已经哭红了。看到她进来以后，高振普说“你的眼睛这么红，这样怎么行啊？赶紧去洗手间用凉水洗洗，要不然进去以后让江青看见了，可了不得了！”她就赶紧去洗，洗完以后去见江青。进去一会儿许奉生出来了，笑着出来的，高振普也愣了：怎么啦？她就说“她嫌我的手太凉啦，她说她不要我了”。许奉生撒腿溜着门就出去了，赶紧跑啊！她一点儿也不想再在江青那儿待着了。

周：江青也曾诬陷我给她吃的药是毒药，可吃了毒药既没中毒身亡，也没出现中毒症状。她以莫须有的罪名关了我一年多。事实是几年里我悉心护理她，从没出过任何差错。江青的头发一直都是浓密、乌黑油亮。由于她在不同场合多次控诉护士给她吃毒药造成头发干枯，大把大把地掉头发，使人误以为是慢性中毒使她头发掉光而戴了假发套。当时赵柳恩在江青的疾言厉色逼供的巨大压力下敢讲真话，为我申辩，太不容易了！我敬佩她的人品，也珍惜我们的战友情。

赵：江青这人就是疑心重，她曾经问我：“你为什么叫赵柳恩？”我说：“我的名字是爸妈给我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实际上我明白，我是在柳州生的，父母希望我记住柳州对我有养育之恩。江青有个毛病，喜欢给人改名字，她说把你这个名字改了吧，你就叫“赵柳”吧，要不就叫“赵恩”。我说改起名字来手续挺麻烦，最后没改。她就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啊”。“九一三”事件出来以后，她就把我和林彪家的事联系起来了，就说“怪不得你要记住柳州的恩情啊？因为林彪的母亲葬在柳州”。开始我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后来我一琢磨，那这名字跟林彪的妈妈葬在那儿有什么关系？这不是瞎怀疑么。

杨：小周是被江青陷害关起来了。1973 年的春天，汪东兴到 10 号楼和江青谈事。谈完

下楼要走的时候，我说汪主任你可不能走，我们有话同您讲。我说小周有什么错误？为什么关起来？好几个人都围上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跟汪诉说。

赵：我们同汪说，我们现在吃不好也睡不好，经常做恶梦。江青是什么政治局委员？马列主义对别人不对自己！警卫员大周说：“我们一只脚在监狱里面，另一只脚在外头，天天就是这种心态。”汪说：“我原以为你们还是孩子，看来你们还都挺成熟的，长大了，懂事了，这个事你们放心。”

杨：后来汪东兴和周总理就到毛主席那儿汇报：“我刚从10楼来，那儿的工作人员心情可不稳定啦，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主席问为什么？他就把小周的事说了，主席立刻就火了：“还有这个事？她从哪儿抓起来的给我放回哪儿去！”当天就把小周放出来了。

赵：主席还说过，“她那个地方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好好地出来的。”还让写出江青身边工作人员名单保留下来。

杨：这句话是针对我和周金铭出事说的，主席说“他们在那儿工作，她不但不关心不爱护不帮助，出来以后还扣上大帽子，从她那儿出来没有一个好好安排工作的。”

赵：大家都想离开江青那儿，可是想走也走不成啊！如果允许大家五分钟内离开这个楼，门马上会被挤破，大家都要跑，一个人也不会留下。

护士结婚风波

赵、周：我们受了委屈就向程师傅诉说，忍不住时就哭一鼻子。他同情地给我们出主意说：“你们在这儿也干了好几年了，怎么给她干也没有好下场。我看没有一个人能好好地离开这儿的，赶紧结了婚就走吧。我们男的没办法只能在这儿就呆下去。”实际上不结婚你根本就没有任何一条路能离开她，你绝对不敢提出来：我要离开这儿，我不想在这儿干了。那不自找倒霉吗！

杨：江青向来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她曾说过：“要结婚跟我说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人家提出结婚的时候，她当时同意了。但没过几天她就怒气冲天，说什么：“我正在冲锋陷阵正需要她的时候，她提出结婚就是影响工作，是结婚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

赵：为我结婚的事儿，江青居然能闹到政治局会议上去。那时候我在江青身边已经工作了好几年，年龄也不小了，一直没交男朋友。江青曾说过：“不要太眼高了，（警卫）二处这么多小伙子，你就从二处找一个嘛！”后来我和二处的小张（整理者按：指张云生）交往了一段时间，彼此相处不错，开始谈婚论嫁。我特意选了个江青心情好休息得还可以的时间，对她提出我想结婚的事。并表示：“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您要同意了我就办，不同意就不办。”她说：“娃娃，我同意。哪有不同意的？在九天庙外（钓鱼台北门对面）找间房子你们就办吧！”这是我记忆中江青唯一一次称我为“娃娃”，透着一种长辈的亲切（因为不习惯，我还愣了一下）。哪想到才过几个小时，晚上要到大会堂开政治局会前，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又发火说：“我要不同意呢？”我说：您不同意那就再说吧，我服从组织安排。她从卧室走到大厅时又问我“结婚是你提出来的还是你对象提出来的？”我一听她口气不对，怕她迁怒于小张，就说是我提出来的。“我不相信，一般都是男的主动，女的不主动”。我坚持说是我提的。“真是你？”她站起来瞪着眼狠狠地盯着我，一步步走近，突然朝我胸口“咚”地就给了我这么重重的一拳！她吼着“你不要脸！”还说了许多侮辱我的极难听的话，今天在这儿我都没法说。我当时就傻了！又气愤又委屈，没想到她这个政治局委员对我张口骂脏话，抬手出拳打！出来后我告诉了在门口值班的王振荣（整理者按：江青所住楼的警卫战士），他同情并出主意说：“你真傻，当时你就该躺在地上打滚，说‘打疼了’。”我说：“我不会呀！没有哪个政治局委员像江青这样对待工作人员的！”

紧接着，在去大会堂的车上江青就一路叱骂我，还逼问：“你的对象叫什么名字？”我

怕牵连男友就一句话不说。那天中央政治局在福建厅开会，她在会上大吵大闹：“批林批孔，我在冲锋陷阵的时候，我身边工作人员竟然提出男婚女嫁……”还说了许多不堪入耳和侮辱人格的话。她当时就逼汪东兴处理我的男友。汪主任从会议室出来，看到我说：“你呀你，怎么这时候提出结婚的事，也不先向我报告？”我说：我看她心情好时才提这事，如果报告你怕牵连组织而引起不好的结果。我个人的问题由我自己承担。汪主任说：“她让我出来处理解决你们问题，叫小张到西藏去。但是你放心，我不会动你小张一根毫毛的。”江青提出让他去西藏，他后来到底去哪儿了我并不知道。一天江青问我：“你的小张到哪儿去了？”我说不知道。她说：“不会失踪吧？”我说没有人告诉我他去哪了。事后汪问我：“你为什么对江青说小张失踪了呢？”我根本没说过这话，是江青自己说的。我只说：“确实没人告诉过我小张行踪。”江青就是这样出尔反尔，将她说的话，硬扣在别人头上。我们俩结婚的事就拖下来了，拖了一年。

杨：让张云生同志说说，后来你到哪儿去了？

张云生(以下简称张)：那天警卫局邬吉成副局长给我打电话说：“把你的东西收拾收拾。”一会儿邬就从大会堂开来一辆白色伏尔加车。当天晚上就把我送到中南海警卫局一处东边的那个小屋。里面放杂品，一个乒乓球案子上全是土。我对邬局长说：“江青是什么政治局委员？我犯哪一条法了？按婚姻法规定我们年龄早超过了。你觉得不合适我们就不结婚嘛，干嘛非要闹成这个样子？还大闹政治局！”老邬说：“这些组织上都知道。”

第二天汪主任就把我和邬吉成叫到他的办公室。汪主任说：“小张，不要紧张，今天你就去广州，西哈努克的母亲在广州小岛住，你去那做警卫工作。”邬吉成让我赶快走，今晚就走，当晚我没告诉小赵，自己坐火车去了广州。

我在广州住了三个多月。之后西哈努克的母亲来北京，我又在那工作一年多。我与小赵经历了各种磨难终于在我回京后结婚了。

赵、周：人们一般赞美结婚的词语都是美好、甜蜜、幸福，并受到大家的祝福。然而我们这些为江青辛苦服务多年的保健护士，却因江青的干涉、责难、谩骂，使结婚充满了担忧、苦涩和泪水。这些痛苦和眼泪只能往自己肚里咽。

赵：江青后来对我说，“我知道你个人的问题我没给你处理好，你心里面有点怨言。你放心，我现在找人呢”。就找了马晓先来替我。我走了以后才一两个月，有一天程师傅到我家里去，说“老太太问你有没有孩子？怀孕了没有？她想让你回去上班。”我说你告诉她，我现在感冒了，不知道是怀孕还是感冒。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我本来身体就不好，那时瘦的就没个样。再说，当时经济条件也不好，我本不想马上要孩子。现在听江青这么一说，吓得我“算了吧，赶紧要个孩子，只要怀孕她就不会叫我去了”。就这样有了女儿。即使这样，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她还叫我去替了一次班。

张：这期间，江青还到处打听我。汪东兴怕我在西哈努克母亲那儿工作，被江青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又把我送到了江西五七干校。我在江西五七干校又待了一年半。中间只回来过一次。

赵：快生孩子的时候，他才回来探亲，没出满月他就回去了。我怀孕、照顾孩子还要坚持工作，一个人太难了。长夜的那串泪珠流到枕头上……

李：天道好还，报应不爽。我听说张老师您后来参与了抓捕“四人帮”？

张：是，我亲手抓的姚文元。和高凤利两人，就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东侧那个厅。高凤利是守在门的东侧，我在西侧，姚文元一进门，我们就从两边上去，一人抓一只胳膊，给他来一个“缠臂压肩”！他“哎哟哎哟”地叫，呼喊他的警卫员。随即，我们把姚文元押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面前，他宣布了中央对姚文元隔离审查的决定。

周：也没反抗？

张：反抗啊！从怀仁堂东侧那个门出去，走到海边有个小亭子的地方，他说了一句话：

“你们为邓小平翻案！”我叫高凤利，“把手绢掏出来，塞住他的嘴！”他才安静了。

李：姚文元这么敏锐，当时就联想到“为邓小平翻案”的问题？

张：他就喊了这么一句。到地下还比较老实，到后来又有一次反抗，装痴卖傻。

杨：你们一直在地下？

张：在地下室呆了六个月零四天哪。最初爱人都不知道，以为我失踪了，那时任务是保密不能讲的。半个月洗一次澡，洗完澡再拉下去。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是半个月或一个月可以回家一次，也是车接车送。地下隔离室有两个沙发、中间一个茶几、一个沙发床。卫生设备齐全。姚文元就在这么一间房子里活动睡觉。那时候这一组就四个人，有我、高凤利、康海群和师职干部滕和松。二十四小时守着姚，两人一组两班儿倒。他躺里头，我们这两人必须得看着他。值班时不能打瞌睡，太困了咬嘴唇也不管用，掐大腿根的肉也不管用。没办法就抽烟提神。中间有一次，姚文元装痴卖傻，往外跑。那时候人一急了眼也不知道有多大的劲，我抓着他的后衣领子，“噌”，把他从门口一下子摔回到沙发上。我跟他说，党的政策你是明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老老实实的，我们不能把你怎么样，你不老实那情况就不同了。我们现在两个人看着，我们是干什么的？你能跑出这屋去吗？后来他老实了，再也没往外跑。

李：那他整天干什么呢？

张：看书啊。他自己要《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看完了以后换。平时就在那沙发上坐着，困了就睡，再一个起来溜达溜达。整天就是这样生活的。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交谈，最多就是他要点什么东西，比如纸啊、笔啊、书啊。我们写个简报，上边觉得该给他拿来的就拿来，不该给他拿的就不理他了。

他的头发都是我给他理。里边生活设施挺好，有厕所有洗澡的地方，那地下的设施全着哪！

杨：在粉碎“四人帮”以前，包括警卫局二处的同志、十楼的同志，对这四个人那是恨之入骨了，已经很了解了。

张：1976年10月6日那天正好我值班，那时候警卫团改成警卫师了，副师长一开始叫高云江出去，接着又叫黄介元出去。人员出出进进的，我们都看出今天要有大事，一会儿又叫我这个参谋。实际上武建华、汪东兴的秘书这些人在里头物色到谁去就谁去。人都选好了以后，就一组一组地由汪主任进行谈话。那时候他在中南海南楼办公，他找我们谈话，都要到南楼。他找我们谈的第一句话：“你们闻到火药味儿了吗？”我们没吭声。他接着说，有人要搞“四人帮”，你们能猜出是哪些人吗？我们心里有点数，我们经常接触这些人，什么人经常在一起活动都很清楚嘛！

李：这“四人帮”你们心里猜得都非常准确吗？

张：非常准确。我们中有位同志首先说，“四人帮”有谁有谁。汪说，那好，今天晚上你们就去执行一个任务，具体布置，听武建华的。武建华就布置任务，我们这一组的负责人是滕和松。

赵：警卫一处的。

李：那时您知道要抓谁吗？

张：这个任务交代很清楚，就抓姚文元。

杨：抓“四人帮”的时候我在政治部保卫科，第二天就知道有事了。因为怀仁堂两侧架上机枪了，荷枪实弹，各个大门内都摆上障碍物了，大粗的木头钉上大钉子，设路障。

张：部队都集结了，成卡车的部队，一看就能看出来发生大事了。

杨：一级战备，干部都不让回家，我们都不能回家，知道出大事了。他们是具体执行的，一个是高云江去了，黄介元去了，你去了，这我都知道的，还有吴兴路吧？

张：警卫团里有我、李广银、黄介元、高云江、吴兴路。交代的任务是我负责姚文元，

高云江和黄介元负责江青，李广银负责王洪文，纪和富负责张春桥。

杨：挑的都是膀大腰圆的。

李：作为警卫人员，原来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的，当然也包括王、张、江、姚。突然有一天接到命令：对某几位中央首长下手。这个弯儿怎么转？

张：这个弯子啊，转起来好转。因为在中央身边，政治运动那么反复地折腾，你就有嗅觉了。再有经过平时的观察，他们几个人那种诡秘的行动，你看看老是这几个人。虽然不知道是密谋是干什么，但是觉得不正常。为什么汪东兴叫我们开会，问“四人帮”是哪几个人，我们张口就能回答上来呢？这可不是一天之功。

赵：有直觉。那时候我们对总理的感情都挺深的，谁要对他不好，我们心里面就很不舒服了。到后来总理都已经有了癌症了，这些人还一个劲地整总理，让你就有一种心疼的那种感觉，你想想还能对他们有好印象吗？

张：就我个人讲，那就更好转了。知道为什么吗？

李：直接受迫害？

张：对。我和老伴儿两人婚姻的问题，江青把我从二处弄走，要把我弄到西藏劳改，组织上为了保护我送我到江西五七干校。你再看她平时做的事情，说的话，对下怎么对待护士、秘书等工作人员，对上怎么对待总理，以及对中央有些事情的处理你都能看出来，你们看不到，但是我们看到了。

我们为什么尽心尽力为江青服务

周：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说江青那么坏，你们还服务得那么好？说起来，原因也是很复杂的。

首先，是党性要求。因为我们都是组织委派到她身边工作的，而我们全力以赴地工作，就是为了避免由于个人的不慎给组织造成麻烦。

其次，是职业操守。从医务人员角度考虑，我认为江青由于内分泌功能失调而引起的诸多症状。如经常出汗，内衣甚至棉袄腋下都会湿透，出汗后更怕风，这些我都能理解。作为保健护士的职责和医务工作者的职业操守，我想办法使江青放松，尽量避免精神紧张；用按摩帮助她提高睡眠质量；她出汗时及时帮她擦干并换上干衣服防止受凉等。天天如此，即使受了再大的委屈也没有丝毫的懈怠。

1968年冬的一天，江青看了程砚秋主演的电影《荒山泪》后很激动，深夜突发奇想立即去程家。由于夜深风寒，程家房间里温度又较低，她受了寒，感冒发烧好几天。多日的发烧使江青心中害怕发慌，她请周总理到楼下客厅办公，负责主持会诊，和专家们研究治疗方案。吴阶平召集总理保健医生卞志强、北京医院吴洁、301医院曾诚富等专家会诊。江青还让毛主席的吴护士长和周总理的护士许泰生过来，她们护理经验丰富、技术精湛、处事非常稳重，给予我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她们在生活上对我很关心，热好饭让我抽时间吃，还帮我洗衣服。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她们的到来犹如雪中送炭。过了几天江青又让她们回去了。

问当时我什么感觉？我觉得自己没照顾好江青就是对不起毛主席。她有病了把毛主席他老人家都惊动了，毛主席亲临11号楼，还感谢我们工作人员。我感到精神压力很大，甚至有一种负罪感。江青身边真是无小事啊！她每一个小事都是大事，都可能牵扯到政治局（现在想想，哪个人没得过感冒发过烧？）。那时期可谓文山会海，江青有时说不舒服就请假不去开会，但事后请总理来楼里谈，往往总理连饭都没吃饿着肚子。总理忙起来忘记去卫生间常憋尿，需要提醒他。可在江青这儿谁敢进去提醒啊！时间长了总理的警卫员和医生非常焦急。这次江青生病，我看到总理每天开完会那么疲惫，甚至吃不上饭，还得到11号楼楼下边办公边要操心江青医疗上的事，我心里十分担忧和不忍。责任和压力使我经常流泪，同时

更加竭尽全力护理江青。在那段时间里，打针我先在自己身上试，吃药我先尝，没什么不良反应才给她用。喂水、喂药、喂半流质饭、换衣、换被、擦身、口腔清洁、测体温，24小时忙个不停。经过近两周的有效地治疗和悉心护理，江青的病痊愈了，我却病倒了。

我就觉得后人应该体会我们当时的心情。不是说我们任劳任怨就是甘愿当牛做马？那是责任在身。我们想离开那个地方，可你想走也走不了啊！江青要是知道你不愿为她服务了想离开这儿，其后果不堪设想！

杨：我们无微不至、尽心尽力为江青服务，有两个原因。一个她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不要说她是政治局委员），我们热爱毛主席，我们为她服务就是为毛主席服务，这是总理经常跟我们说的。

阎：“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也是毛主席本人说的。

杨：这是一个精神支柱。第二，我们是组织派去的，是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不能有任何闪失，如果有闪失对不起组织。1968年江青生病那次，毛主席去看江青，我们都列着队等着主席来，每个人的眼睛里面都含着泪花。主席跟每个人握手。主席说：“你们辛苦了！”我们说不辛苦。主席说：“不辛苦是假的，在这儿服务不容易。”主席说这个话多温暖哪！

李：在您为江青服务期间，她去主席那里频繁么？

周：我在江青身边当保健护士期间，江青除了去外地，在北京绝大部分时间住在钓鱼台。那时期江青经常去中南海看望毛主席。她先让秘书打电话询问主席是否休息，如主席没休息，她立即坐车去。江青曾在中南海丰泽园家中和怀仁堂的小厅小住过几天。她精神好时就散步去毛主席住处。

我见到江青在见过毛主席出来时发过两次火。一次是她出汗了，就认为室内温度高了（实际室温是合适的），对那里的工作人员说“我都出了大汗，温度这么高，你们这是给主席制造感冒，要负政治责任的！”在走廊的一个小房间，我为江青擦去汗，换上干的衣服才出门上车。另一次江青见过毛主席后到值班室，指责室内空气不新鲜。指着值班的警卫局张局长（整理者按：指张耀祠），说他“失职”、“斗志衰退”，然后气恼地走出大门。

李：平时主席叫她去的机会多吗？

赵：我去的时候主席的身体就不是太好了。那时常去怀仁堂开会，江青说主席没病，他身体一直都挺好的，我的身体比主席还差呢！经常闹腾、吵，吵得总理都没办法，政治局的人对她的吵也束手无策。她想去主席那就事先让秘书给主席秘书打电话，看主席是否有时间。江青嘱咐只要主席那儿来电话找她，不管什么时间都要叫她。有次江青已吃了安眠药睡下了，主席找她，我马上叫醒她并递上一杯浓茶，她虽走路有些摇晃，还是立即去了主席那里。回来后还很高兴呢。

那次我印象特别深，出门的时候大概是上午九点，她一边晃得东倒西歪，一边似醒非醒地拖着长音念叨：“今……天的太……阳真……好，真暖和”。我跟在她后面学她走路，她晃左我也晃左，她晃右我也晃右，扶着她的警卫员看见了，回头冲我指指点点，我就挤挤眼——没办法，工作环境太紧张，只有苦中作乐。说实话，后来也有点皮了。

江青人性化的一面

李：江青对工作人员的苛刻甚至迫害显然是事实，但不知道她生活中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面，比如人性化的一面？她应该不会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剑拔弩张横眉立目的吧？

周：江青往往服下几次镇静药后，态度和缓一些，说话也多了，其中也有一些“家常话”。我刚去不久，有一次她对我说：你们来替我服务，是组织上请你们来的。我这个人生过病，植物神经紊乱，有眩晕症，所以我不能自己起床、穿衣服，一切都请你们动手。用你们的体

力劳动来让我更好地进行脑力劳动。意思是让我们理解她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方式是疾病造成的，还要我们看看她的病历以加深了解。

我曾听她讲过在延安的生活情况：听毛主席作报告时，她怎么专注地记笔记；在延安演戏时，主席到后台看她，见她穿的衣服单薄，就脱下自己的大衣给她披上。可见每个人都有值得回忆的往事吧。

赵：她还说过：共产党员结什么婚呢？又说，结婚千万别找年龄差距很大的男人，不幸福。我就是和主席年龄差得大，现在连见主席一面都不容易，还要请示。

周：她还谈到过自己的家庭，说父亲是做大车轮的手艺人，很凶，经常打骂母亲和她，甚至打得嘴里出血。小时候生活苦，脚生冻疮，衣服都缝的很大，袖子要卷起来，这样可以多穿几年。有时候晚上我帮她洗澡，她也聊聊她的姐姐、女儿，透露出惦念她们的感情。

除了家事，江青有时还说到一些人和事。我始终不插话、不表态、低头干活，默默地听。

赵：江青对我也讲过她父亲厉害，母亲常挨打。她在上海有时穷的只能买一个小烧饼充饥。一个女人活动不安全，演艺界的朋友就曾做过她的保镖等。

江青的手很巧，毛衣织得很好。当时她天冷时用的围腰都是自己织的。有一次她对我说，现在我老了，眼睛花了、手也不利落了，你帮我织一个吧。我就给她织了一个围腰。

周：江青说在延安的时候常织毛衣，毛主席的毛衣都是她织的，还给康生织过毛衣。大生产运动中她织毛衣又快又好。她说她的织法跟一般人不一样，还教给我怎么织：先把领口织出来，然后再从肩往下织。说这样织出的毛衣穿着舒服。

有一次江青按铃，我进去后吓了一跳，她抽泣着哭得很伤心，不停地用小毛巾擦眼泪鼻涕。我赶紧问她怎么了，哪不舒服？她手指一本书哽咽着说不出话，那书是《闻一多全集》。我给她擦汗换上干衣服，又送上茶水，喝了几口她才不哭了。她说“我听过闻一多的课，想起他我就伤心”。江青说她在青岛大学旁听过闻一多讲课，后来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我想这是江青真情的流露吧！

江青有一部木盒精装的二十四史，一部史是一个木盒，拼搭起来占了书房的半面墙。她批评我们不懂历史，太无知了，就买了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楼里每人一套让大家学习。几年后这几本书我都读过了。她还让我读《双城记》，说这是英国作家狄更斯写法国大革命的事，应该看。她把书给我后，我翻了几页看不懂，再加上工作忙这本书就没读下去。过了一段时间她问我书读得怎么样了，我说实在看不懂，就把书还给她。她摇摇头，还好没发火。

赵：有次她想起《茉莉花》这首歌，问我会唱吗？我说会唱江南曲调的，她就叫我唱了一段。

赵、周：她挺注意学习，并不是“不学无术”的人。她的字也写得很好，是“毛体”。她读过大量的历史书，历史典故记得很清楚。她经常看线装的《红楼梦》，她说这本书是封建社会的写照。在卫生间我们多次听她说关于《石头记》、脂砚斋、曹雪芹、高鹗和《红楼梦》前后多少回等。具体评论记不得了，只记下这些只言片语。她闲时还吟些古诗词，也自写些诗。外国名著也经常看，平时起床后在厕所里坐便时要看报纸和书，看后在书里还夹上书签或纸条。吃饭时，常听一些老唱片，余叔岩、程砚秋、裘盛戎、谭派的唱段她都听过，对京剧流派、唱腔也很内行。对世界名曲也很欣赏，就餐时也常听。

与林彪、叶群的交往

郑：“文革”结束以后，林彪、江青被叫做两个“反革命集团”，而且说他们又勾结、利用，又明争暗斗。据你们二位观察，江青和林彪来往多吗？

周：江青和叶群交往比较多，叶群送来的礼物她都接受，如毛主席像章、语录、毛选四

卷合订本、水果及衣服等。

叶群经常给江青送些时令水果，如南方的西瓜、枇杷等，江青都收下也都吃了。有次送来当时罕见的芒果，她告诉江青吃芒果不粘手的方法：刀在芒果正中做环形浅切口，左手切，握住切口左边，右手来回旋转右边果皮。皮和果肉分离后，先吃右边果肉，再用果皮套在果核上。同样方法吃左边果肉。叶群态度谦卑，边说边演示。确实用这种方法能不粘手。事后江青说“叶群可真会吃啊！我才不费这个时间，还是你们弄好再给我吃吧！”

江青睡前吃安眠药后总是有些摇晃，她担心会磕碰。叶群得知后就主动提出帮助解决，江青欣然同意。于是叶群带着林立果来到十楼，进门后叶群让林立果叫工作人员“叔叔”“阿姨”，然后就到卧室仔细测量了床和周围家具的尺寸。几天后，叶群、林立果送来了浅驼色布罩的海绵床围、柜围和沙发式马桶等，并立即安装好。这些装置尺寸合适，确实能起到保护作用，江青看后表示很满意，并感谢叶群母子俩。这些东西江青一直使用着。

江青说过，“林副主席的病跟我差不多，也是出汗，怕风怕光”。所以林彪的建议她一般都采纳。比如林建议她喝荷梗水清热利尿，她接受了。程师傅帮着给煮好了，我们先尝，味道很清淡，没一点儿苦味。江青也能接受，一天喝两回，外出就倒进玻璃罐，放到我们包里面带走。她长年累月地喝，一天也不落下。

赵、杨、周：叶群经常来看江青，走的时候还常常说，“你们得好好照顾江青同志啊，她跟林副主席一样，身体不好啊。”有一段江青闹着要穿军装，跟叶群说这事，还激动地哭了，说“我就是对部队有感情，以前还穿过军装，进城后一直要求保留军籍。现在我什么都没有啦，连军籍都没有啦！……”不久叶群就送她一套陆军军装，吴法宪就给做空军的，李作鹏就给做海军的，分别送给她。江青去机场穿空军衣服；去海岛穿海军衣服；平时穿陆军衣服。叶群知道江青出汗多，帽子圈容易湿，特地做了不少可粘贴的活动帽圈，既便于携带也方便更换，可谓用心良苦啊。

李：对叶群的这些礼物，她一般都欣然接受吗？

赵、周：江青特吃她这一套，都接受。战备时，叶群还给她改制一套军装式的毛皮衣服。

杨：准备到地下防空洞躲藏的时候穿，怕下边冷。你还记得江青那围脖么？那也是叶群给做的。

赵：叶群特别会弄这些事，对她可周到呢。她们这种来往特别特别多。可能叶群接触一些东西比较多，江青接触的少，叶群就经常给她建议建议这个啊那个啊，经常把一些新的东西告诉她。你看那时候都不烫头，叶群烫头，有时候还用口红。虽然是穿着军装啊，鞋什么的还是比较时髦一点的。而江青只要有一个要求，叶群那是必办！你看那些军装，有单的，有夹的，全部都给她弄好了。

李：据说她听从叶群的建议换过血，有这事吗？

赵：输过一次血。她觉得自己身体不好，常出虚汗，认为定期输点年轻战士的血会有所好转。

周：她其实没必要输血，血色素等各项指标都正常。因为出虚汗，叶群就建议输些血，增加抵抗力。对此医生是不同意的，一是不贫血，二是担心有输血反应。但在江青的坚持下，还是从警卫战士中配了血型。我当时还很担心，跟医生说真有什么事我一个人可应付不了。于是那天临时又从北京医院请来一位护士。输血在钓鱼台 17 号楼的放映厅进行，边看电影边输血。输血开始几分钟后，她身上发痒，起寻麻疹，就立即停止了，又注射了抗过敏药，随即症状缓解。一袋二百毫升的血，只输进几毫升。从此再也没输过。

杨：那是 1971 年的事情。她叫我给主席打个电话，报告她输血的事。主席秘书徐业夫给我回电话转达，主席说，“身体第一靠食物治疗，第二靠锻炼，第三靠自身的抵抗力。生老病死，时至即行，鸡鸭鱼肉，逢者则吃……”意思是说不让她再输血啦。

李：幸亏只输了一次，要不得多少战士定期供她血！

赵：林彪、叶群和江青的交往一直持续到“九一三”之前。1971年9月8号，林彪派人给江青送了一筐四个西瓜，放在10号楼的前厅。12日她要到颐和园去玩，叫我们带上西瓜。江说：“我请大家吃海南西瓜，这是林副主席送的！”还说：“把中间那个瓢拿出来，外面那一层你们吃啊，我吃中间那个芯。”我记得特别清楚，心说这么一大筐子西瓜还叫我们吃外面那一层，你吃中间那个瓢？当时在场的有颐和园军管负责人、园内工作人员和江青的随从人员。

“九一三”的夜里，我们接到通知，就急急忙忙把她叫起来，去了大会堂。服了安眠药以后的江青，起来喝一杯浓茶也不管用，走路踉踉跄跄的。到了大会堂，听说主席在大会堂的一一八厅（我们没有见到主席），说主席已经回来了，总理也在。这时候才觉得今天晚上一定出大事了。过了几天她就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保密，暂时不能告诉你们。现在我请客，请大家喝香槟！但夜餐费得你们出钱。”她经常干这种事情，说是请客，实际上每次都是“我请客啊，你们出钱啊”，你们自己掏自己的钱，就像那AA制似的，但是香槟是我来出。中央下达文件后她还说“我早就看出林彪不是个好东西了”。我心说你要看出他不是好东西你能吃他的西瓜么？你不怕他毒死你呀？我就是觉得有些问题不见得她都看出来了。”

尊重康生

周：江青很尊重康生，尊称他为“康老”。看电影也通知他，来或不来江青都不介意。甚至康生边看边打呼噜动静很大她也从没烦过。康生平时直呼“江青”，不像其他人称她“江青同志”。康生出的主意她也欣然接受。江青牙周发炎，康生建议她用竹沥盐水漱口，并告诉了制作方法。她就让程师傅制作，程师傅用新鲜的竹子，把大粒粗海盐放在里头，竹筒口封好，在烤箱里烤，连竹子里面的膜都炭化了，盐也变得黑乎乎的，就是竹沥盐。江青就用竹沥盐水漱口，有时候出汗多，就喝点竹沥盐水补充盐和水，这做法保持了好几年。后来康生有病，进食很少，好像总怕那里边有毒。江青就让程师傅做几样小点心，拿到8号楼（康生的住地）去。她当着康生的面先吃了，康生紧跟着吃。江青说过：真奇怪，别人喝过的茶，人家走了，康生赶紧抢过来就喝。（那就证明水里没有毒嘛！多年后才听说康生从延安以来整的人太多，积怨甚多啊，所以疑心很重。）江青回楼后讲了康生的事，表示很担忧康生的身体状况。

赵：江青经常给康生送花。有一次去康生那儿送花，她执意要亲自开车。她学过开车也喜欢车，但驾驶技术不熟练。那天她的司机不在，车管科的刘德简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我在后面扶着她那堆花。她就自己开车去康生住的八楼，那不是有一个拱桥么，下去的时候这车就冲着湖里去了！已经下了马路牙子了，刘德简“啪”把方向盘往左一扒拉！可能就扒到她的手了，她冲着刘德简就发火了，“你怎么抓我的手啊！”实际上再不管我们三个人全部都得掉到湖里去了。

惹不起的游客

阎：你们说说景山那棵歪脖子树的事。

周、赵：那是1971年春天，当时北京市许多公园处于关闭状态。江青说太累了，要放松一下，让吴德给她了解北京有什么花可以照。一了解，说景山公园的牡丹园花开得好（景山公园当时也关了），江青就到了景山。当时万里刚复出，北京市派他来接待江青。她对万里态度很冷淡，还冷嘲热讽。游完牡丹园再爬山，途经路旁一棵歪脖子树，牌子标明崇祯是在这棵树上吊死的。江青勃然大怒，冲着陪同的万里发了火：“这都是封资修的东西！这颗歪

脖子都死了，你们还留在这儿？你们是不是想纪念他啊？你们是要封资修，还是要社会主义？马上刨掉！”说完就走了。后来这棵树就不在了。她在返回的汽车上怒气未消地说：“这个万里啊不是好东西，完全是孔孟的那一套，他是曲阜师范学校毕业的。”

周：还是那一年，江青到香山碧云寺去，还是万里陪着。游完一出门，她当面叱骂万里：“你刚被放出来，又想进去是怎么的？你还不知道你的罪吗？你还搞这一套？你们是国民党的北京市委啊还是共产党的北京市委啊？”

杨：那次主要是为两个事。一个就是在五百罗汉堂里转了一圈出来，发现东西两边墙上各有一条毛主席语录，她马上脸就变了，“怎么把毛主席语录挂在封建主义的地方？很不协调嘛，立即给我摘下来！”

再一个是为孙中山的水晶棺，江青说：“怎么把孙中山的水晶棺放这个位置上，极其不严肃，给我弄回南京去！”火气特别大。转弯到了小卖部，有个十七八岁的小售货员，在那儿卖东西。江青进去了，那阵势，那么多人，把小孩吓愣了。江青指着一把小扇子，“拿给我看看”，那小孩不但不给她拿，还往后退了几步，“拿给我看看”，又退了几步。她火了。

周：江青说：“我来了你还这样，对我都是这种态度，要是工农兵，你还不知道怎么对待他们呢！”

杨：她还说：“你还在这儿服务，给我滚蛋！”小孩吓得直哆嗦。

赵：小售货员有癫痫，惊吓使他一下子倒地嘴吐白沫了。江青说：“这种人不能留，这里面的东西我都包了，我请你们吃！”

赵、周：我们工作人员看江青对这个售货员太凶了，既担心他受不了，又怕他的领导再追究。邬处长、程师傅、杨秘书趁江青休息时赶忙找碧云寺负责人作解释和安抚工作。

杨：我跟万里说，你千万不要处理他。回来以后我就又给吴德打了电话，把情况跟他说说了，我说千万不要处理那小孩，小孩什么毛病也没有，就是害怕，没见过这场面。

江青的日常花费

李：江青平时的开销都包括哪些？

赵：毛主席那一代中央领导人，煤气费、房租、饭费等等，都按时缴，江青也一样。

周：在大会堂只要吃一餐饭，管理员都会定期去结账。定做衣服和鞋都要交钱。江青买胶卷和洗印照片花费比较多，有时候工资入不敷出，就经批准从毛主席那拨些款还账。这套制度很严格，江青也是遵守的。

赵：无论在驻地还是外出，江青都是自己带茶叶。有一次她说，“我的钱因为照相全花光了，从现在开始，谁来了都不上茶，就给白开水。”于是不管谁来，包括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些人，我们都给送白开水。有一天周总理来了，一进大厅，我送去一杯白开水，总理打开杯盖一看，愣了，就那么看着我，杯子一递：“我要喝茶！”我就赶紧接过来。江青要发火这怎么办？门口有几个人在，他们说“总理要茶你就给他泡嘛！”于是我重新给总理上了一杯茶。

周：我们俩真是很难哪！因为端茶送水是我们的事。有次我送上白水后，总理一手端着杯子一手拿杯盖儿，“小周，茶，茶！”为送茶的事，我和小赵特别伤心。总理那么疲劳，来了喝口茶解解乏是人之常情。这不是我们忘记了放茶，是江青有令啊！我俩商量既然当着江青的面换了茶水，以后总理来了我们都给送杯茶。

李：她那个茶是自己买的吗？

杨：她自己钱买的龙井茶。

赵：江青对这些日常开销还真是挺细心的。比如她吃鸡蛋光吃蛋白，就问“那蛋黄儿没吃都哪儿去了？”程师傅说能卖的就卖到我们工作人员的食堂。“那我吃饭喝的那个高汤，

骨头和肉怎么办哪？”程师傅说也放在工作人员的食堂卖了，有一些时间长了就埋到地下当肥料了。程师傅是不沾一点的，我们也不沾。在京和外出吃饭就在食堂，该交多少钱就交多少分文不少。

周：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遵守纪律和规章制度很注意影响。跟随江青外出到海南岛，驻地有许多椰子树，大家看到战士从树上砍下椰子喝里边的汁感到很新鲜。但观察周边没有卖椰子的，我们不敢打听也不吭声，生怕当地驻军知道送来椰子不收或少收钱就麻烦了。窗外就有许多椰树，可我们并没尝到椰子汁的味道。临走时海军送了漂亮的海螺壳、贝壳及当地砍下的藤棍，经小组讨论后认为不能收就婉言谢绝了。

澄清一些谣传

李：“文革”后期以来，由于痛恨江青的所作所为，民间一直流传一些关于她的段子，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时过境迁，显然也不能拿段子当史实。在这方面，希望您二位作为亲历者，有所澄清——证实，或证伪。

赵：社会上曾流传庄则栋等人的一些事，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江青半夜三更打电话”，对这些事情应该实事求是。当初中央领导人的工作都是在晚上，江青分管文艺、体育，有时找于会泳、刘庆棠、浩亮、庄则栋商量事，说她跟他们之间有不清楚的事情，不符合事实。江青会客时，护士要续水，送水果，秘书也经常被叫进去。那时江青已经 50 多岁，身体又不太好，日常生活离不开护士。说有男女关系问题，简直是无稽之谈，应该澄清。我在那期间她绝没有这种事。

周：有人在文章中描述了江青在文革期间游泳有不雅照片之事，这完全信口雌黄。我在那几年时间，见到江青游泳共两次，都是在中南海游泳池。她除了身着泳衣头戴泳帽外，与众不同的是脚上还穿上乳白色薄橡胶套鞋。江青游得很好，但因感到水温低，游的时间都不长。当时在场的只有身边工作人员和一中队的警卫人员。

江青很严肃，给人以不怒自威的感觉。我在那儿工作的几年中，江青绝对没有男女暧昧之事，也从未见庄则栋进过江青住的楼。我虽遭江青陷害曾一度失去过自由，但对这些无中生有来自各种渠道的传言，还是应该如实说清事实真相。

赵：我跟随江青去北戴河时，她在海里游泳只有身边工作人员和部队警卫人员。

阎：关于这个问题我看到了庄则栋本人的说法。

郭小林在《郭小川借调到国家体委之后》（整理者按：《炎黄春秋》2009 年第 2 期）一文中说：

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一次去开水房打水，鲁光又遇上庄则栋，就把他拉到一边问道：“都说面首、面首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庄则栋说：“绝对没有的事！我和江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过！只有一次，她在小靳庄住所的办公室里养的小麻雀飞了，让我和刘庆棠抓，江打了我屁股一下，说：“冠军，给我抓住它！”庄则栋曾对采访他的人说：“江青其实是挺有威严的，她对于我们来说就像长辈。”

赵：有些人说江青是“假发、假胸、假屁股，”对这种传言，我们应该澄清，她身上所有部位没什么是真的。

李：这就是开始说的对江青妖魔化的一部分：因为她是坏人，坏女人，她就得上白骨精，就必然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说起来，这也属于造谣和人身攻击，对江青和其他当事人都是不公正的。我认为，其实这类传说也与“红颜祸水”、“女人祸国”的专制文化偏见有关。

警卫员孙立志的遭遇

周：最后，我要为我们的战友、已去世的孙立志同志说几句话，讲讲他的遭遇。1973年我和孙立志在江西中办五七干校相遇，他曾是江青的警卫员。因为彼此了解底细，使得我们之间能敞开心扉交流。他经受了很多的苦难。

他跟我说：“江青太刁，没有理可讲。我想离开她，就说肝区不舒服，让我走算了。可江青让我去体检。当她知道我是想离开她那时儿，就说‘好，你休息一段时间’。接着把我关到学习班，还把我上海的家给抄了。江青强加于我一些罪名，还说我是上海市公安局黄赤波的人。这是一个冤案啊！家里老婆孩子也承受了沉重的压力。我和江青的事情说不清了！她诬陷了我，你说组织上信她还是信我？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当时高大壮实的山东汉子哭成个泪人——他心里太苦了。

大孙来干校四五年了，上边有令不许他回上海探亲。他的供给关系在上海，每隔一段时间家里就寄些粮票和钱来，因为怕信检，都不敢多写字。他爱人和孩子压力都很大，在山东年迈的母亲多年见不到儿子。老人在山东去世后，大孙申请回老家奔丧。当时乘火车从江西到山东还需要在上海火车站转车，上边明确要求：奔丧在上海往返转车时不能回家，直接回山东，办完丧事立即直接回干校。他说：“五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一趟，就是为了让亲朋邻居知道我这人没在监狱里，还有一个自由身。”大孙站在上海的土地上，五年没踏进过的自家门，近在咫尺却不让进！长别离后老母离世，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孩子仍不能相见。这是一种没有人性的折磨！这就是为江青服务过的一位警卫员的悲惨遭遇。

孙立志后来又不幸因公殉职了。他朴实、憨厚、真诚，是一个好人，我深深地怀念他。代他说出这段苦难经历，也是对逝者的悼念和对亡灵的告慰！

阎：周淑英同志说得好，说得对，我举双手赞成！

孙立志同志在我1967年1月去以前就是江青的警卫员，还兼做一些秘书工作，人们都喊他孙秘书，我也这样称呼他。但我调任江青的机要秘书后，再这样叫他，他就给我纠正了。他说：“我不是秘书，你才是秘书，以前我是冒牌的。”

他长我六、七岁，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的工资关系在上海警务处。从六十年代初期起，江青去上海他就负责江青的警卫工作，后来成了江青的固定的专职警卫员，1967年4月中旬因“肝炎”离开江青。他还是党小组长（当时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和江青身边工作人员是一个支部，支部书记汪东兴，副书记张耀祠），和所有工作人员都处得很好。他走后，我们都很想他，希望他能回来。

后来听说，他因我出事受到牵连。江青诬我偷了她保险柜的钥匙，抄了我的“家”（实际上是爱人来京探亲的临时住处），也抄了他的家。把我关起来了，把他也关了半年，放出来，又被送到江西中办五七干校，一呆就是8年，连家都不准回——这是变相的监禁。我蹲了七年半监狱，又流放了五年，1979年平反，1980年春重回《红旗》杂志社工作。

同年夏天我乘去无锡开会之机到上海去看望他。他当时是上海市委警务处的处长，专门负责到上海公干或休息的中央负责人的警卫工作。我们二人相见，悲喜交集，悲的是我们都受到江青的迫害，喜的是，我们在粉碎“四人帮”后都获得了解放，历史是公平的。

想不到，他在90年代初为救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同志以身殉职。他牺牲时距获得解放、当处长可能还不到五年。孙立志是多好的同志啊！我们希望和盼望好人一生平安，但好人未必一生平安。周淑英同志说，在我们这本书中应该写上孙立志同志一笔，这是仗义之言，也是记下江青欠的一笔债。我非常赞同周淑英同志的建议，所以我补充这些话。

周：我们当初是一个很好的集体，是无愧于党、国家和人民的集体。因为当年在困境中互相帮助、伸张正义，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至今还能聚在一起亲如兄弟姐妹。记得阎长贵同志在一次聚会时说：“江青今天说我们这个坏人，明天又说那个坏人，现在看来我们都是好人，只有她是坏人。”与会的同志们都热烈鼓掌，认为这说得好，说得对，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

李：由衷感谢二位老师的讲述！感谢您二位如此全面、系统、清晰而细腻地描摹出一个活脱脱的江青，留给世人。我想，这些故事作为资料，今后无论是对于史学研究还是文艺创作，哪怕是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都有无可替代的参考价值！讲得太好了，谢谢！

（阎长贵、李宇锋整理）